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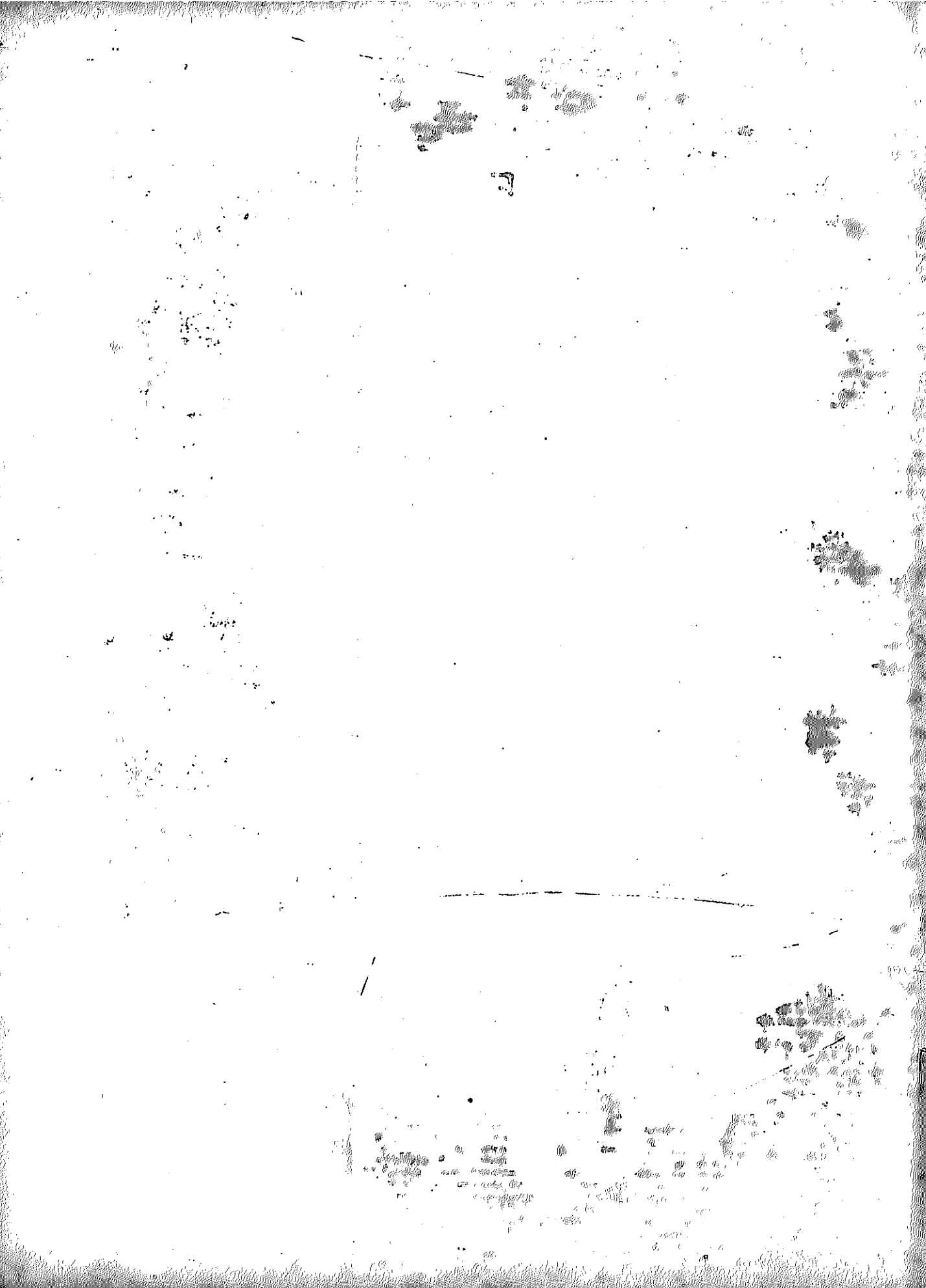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杨世泉  
1974.7.31



1974



#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目 录

###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 抗日战争时期尊孔与反孔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锋 ( 3 )
- 反对党八股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乐 英 ( 10 )
- 从来就没有什么“先哲”.....裘 实 ( 13 )
- 从东北解放战争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余子道 ( 16 )
- 戴季陶主义与孔孟之道.....奚 杰 ( 20 )
- 从青铜器看吃人的“礼治”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巡礼  
.....冯丹枫 茅伯科 翁长松 黄龙珍 ( 23 )

###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 短评：赞工人理论学习班..... ( 25 )
- 我们工人能够学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工人学习班座谈会纪要..... ( 27 )

在批林批孔中增长革命才干.....新海农场 黄龙珍 (32)

###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方 海 (33)

《帝国主义论》历史背景简介 .....余 来 (37)

资料：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摘编 ..... (44)

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 .....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 (48)

杂文：今日之“葛朗台” .....求新造船厂工人 李智明 (53)

## 文 学 评 论

### 党是领导一切的

——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杜鹃山》观后 .....杜华章 (55)

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 .....徐缙熙 (60)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翟青 史洛 (65)

“特种学者”的“考证癖” .....戴厚英 (69)

### 从当代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看苏联侵略扩张的野心

——苏修文学迷评之三 .....翁义钦 倪蕊琴 (72)

##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 这个公社实现了普及教育

——金山县朱行公社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组 (76)

要引导自学，不要“满堂灌”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80)

## 经济问题研究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 .....松江县天马公社商业站革命委员会 (83)

漫话大饼炉子 .....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革命委员会 (87)

#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 抗日战争时期 尊孔与反孔两条路线的斗争

史 锋

抗日战争时期的尊孔与反孔斗争，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在那个时候的一系列批孔指示，深刻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对于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很有必要。

(一)

在近代中国，每进入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或历史转折点，反动派总要把孔老二的幽灵请出来，念上一通孔孟之道的黑经，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尊孔与反孔斗争，就是围绕着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而展开的。

在当时，尊孔调子唱得最高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一面发动侵略战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一面却又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以“孔子之教”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妄想用尊孔读经的手法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使中国人民永远沦为它的驯服奴隶。蒋介石这个反动头子也是一个尊孔狂。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狂热地鼓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是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黄帝子孙之天性”，胡说这种“民族意识胜过一切”，要人们不分“派别”都服从于他们这种“民族意识”的“统一指挥”。这一句话可说漏了嘴。原来蒋介石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了实现他限共、溶共的政治阴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

量统一和溶化到以他为头子的大地主资产阶级阵营中去。

机会主义头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总是觑着反动派的脸色行事，在革命阵营内部起着公开的敌人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王明就在这个时候由“左”倾立场跳到极右，鸚鵡学舌地跟在蒋介石的屁股后面团团转，宣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国人民的“内心精神力量的来源”。他还抹煞阶级对立，宣扬阶级调和，胡说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都是中国“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他妄图用孔孟之道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此出发，他反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划分左中右，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王明这个软骨虫无耻地出卖了革命的原则，竟堕落到吹捧蒋介石“为中国不朽的民族英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袖”、“最高统帅”。他还极端荒谬地要求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对蒋介石代表的国家民族“尽忠”，“行孝”。无论是党和阶级的利益，或者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一古脑儿被他拿去拱手送给蒋介石，作为他晋见最高反动头子的见面礼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混入共产党内的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也跟着一哄而起，叫嚷要做对得起祖宗的“真正的孝子贤孙”。王明一伙为蒋介石抬轿子、吹喇叭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当年在长江流域发展革命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决不容许孔孟之道的病菌来侵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健康肌体。毛主席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光辉论断深刻地指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类儒家教条是反动阶级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名曰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的王明，把这类反动的儒家信条当作灵丹妙药，由此可以想见他已堕落到何等的地步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不作阶级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王明打起了反动孔学的旗号，鼓吹什么敌对阶级要“相互礼让”、“相互敬爱”啦，什么要发挥“民族的伟大仁爱”啦，什么“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啦，完全是一派取消阶级斗争的投降哲学。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全会

的结论中，针对王明只讲“礼让”、不讲斗争的中庸之道，严肃地指出：“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毛主席还针对王明鼓吹的“忠孝”、“仁爱”等孔孟谬论，严肃指出：“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这里一再教育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军队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和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斗争。毛主席以锐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孔孟之道，为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指明了方向。

### (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是进步还是倒退，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重要内容。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是同这种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持久战会把它拖垮，又大唱孔孟的“仁义之道”调子，对国民党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以后，国民党内掀起了一片妥协、投降的声浪，其直接结果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为了替自己的颞颜事敌寻找理论根据，公然说什么只有日本叫卖的“仁德”、“王道”“才能救中国”，标榜他们卖国降敌的“和平运动”“是儒教的真精神”。但这又能帮得了他什么忙呢？叛国投敌，铁案如山。臭名留史，万古挨骂。大汉奸汪精卫的尊孔，再也确切不过地证明了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

汪精卫是面目公开化了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汪精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既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又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急切谋求所谓“光荣和平”。一九三九年三月抛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公开宣扬孔孟之道是“救国之道”，是“民族的精神武器”，同年十月又胡说抗日战争“已由有形的武器抗

战，而入于无形的精神抗战”，妄图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向日本妥协投降。与此相配合，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王明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这个时候干了些什么呢？他密切响应蒋介石的反革命号召，胡说什么“一切忠于国家民族的黄帝子孙，应该更进一步省悟”。他嘴里的“省悟”就是同蒋介石“合作”；反之，同蒋介石斗争就是不“省悟”。阶级投降是民族投降的后备军。王明的这条阶级投降的路线，为通向民族投降搭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刘少奇，同王明穿的是同一条连裆裤子。他在一九三九年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黑《修养》，就是一个明证。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闭口不提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不谈同国民党反共政策作斗争，却去津津乐道地大谈其孔孟的“修身”、“养性”之道。他要共产党员脱离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去闭门进行所谓“自我修养”，身体力行孔老二的“忠恕之道”，做到能够“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这一套修养经去做，那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驱直入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共高潮，就都不要斗争，而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甘心情愿地做亡国奴。由此可见，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倡导的这条尊孔道路，实质上是一条亡党亡国的道路。陈伯达这个反共分子在这场尊孔卖国的大合唱中也不甘落后。他积极响应蒋介石的“精神总动员”，连续炮制了《孔子思想研究》、《新人生观的创造——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认识》等黑文，狂热地吹捧孔老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事业“有其划时代的功迹”，认为维持反动统治秩序的“正名”“有其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的“正统”。在这里，陈伯达这个孔孟之徒的奸细嘴脸不是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吗？

为着把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击退这股降日落共的反动逆流和为这一逆流张目的尊孔复古思潮，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先后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及孔学的反动实质，同王明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中国人民只有毫不妥协地同敌人血战到底，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决不是什么“忠孝仁爱”，什么“宽宏大道”，而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已戳穿了儒家虚伪而残忍的阴险嘴脸，驳斥了那些宣扬复古倒退的反动谬论。在三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的农民战争以其大无畏的革命行动，猛烈地



冲击了孔学及儒家的反动“传统”。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居然奉孔孟之道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蔑。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方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的反动论调。

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又是亡国之道。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尊孔读经必然走向投降卖国。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对孔老三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说，“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孔学长期毒害的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他们只会凭借反动统治者的权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一旦外国侵略者打进来了，他们只会直着喉咙手喊什么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跪下双膝向敌人演奏和平曲，化干戈为玉帛，甘心情愿地充当民族的败类。这种人的面目，正如鲁迅所刻划的那样：“夫莫夫乎尊孔，要莫要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

抗日战争时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同当时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过来又给予它们以影响和作用。蒋介石宣扬尊孔读经，目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王明一伙的应声尊孔，是在党内搞妥协投降，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效劳。毛主席指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是因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们热衷提倡的旧文化旧思想，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只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思想新文化，才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文化是在同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打倒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在理论思想战线上，“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毛主席这些批孔的光辉论述，是对国民党尊孔的“精神总动员”的根本否定，是对王明、刘少奇之流屈从国民党反动派而宣扬孔孟之道的迎头痛击，它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 (三)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为整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伟大的整风运动，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批判运动。党内的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他们信奉的是孔孟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妄想通过熟读“圣贤书”和“自我修养”，就可以成为“天才的理论家”，到处哇哩哇啦瞎指挥。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而“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研究理论、历史和现状，以便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毛主席指出的这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从根本上批判了孔孟所宣扬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力地揭露了王明、刘少奇一伙闭门修养、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这次整风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王明、刘少奇之流，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竭力鼓吹和宣扬“仁者爱人”、“人类之爱”的孔孟之道。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奴隶主不会去爱奴隶，地主不会去爱农民，资本家不会去爱工人，反动派不会去爱人民；而劳动人民也从来不会去爱剥削阶级。反动统治阶级用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是剥削和压迫，是

皮鞭和镣铐；而劳动人民的回答也只能是反抗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什么圣人贤人所能改变的。重明一伙宣扬的“仁爱”、“人性”，就是要人民遵循孔孟之道去爱反动阶级，从而取消革命，实行投降。对此，毛主席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向全党提出了反对党八股的任务，这是批孔斗争的一个伟大的战斗号令。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拿党八股作为宣传工具，用来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党八股在思想根源上同老八股是一脉相承的。什么是老八股呢？就是孔老二的那套教条。过去，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流毒极深，贻害非浅。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和分析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打败孔孟之道。所谓党八股，即重明一伙奉行的洋教条、洋八股，是老教条、老八股的继续和变种，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毛主席严厉地声讨了党八股的罪恶，号召全党起来打倒它，同时深刻地指出：“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这就不仅在当时痛斥了机会主义者宣扬儒家教条对革命的严重危害，还高瞻远瞩地指明了批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的批孔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是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最大祸害。清算重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孔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是要搞复辟倒退的，无论是国内外的反动派，或者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要抬出孔老三来作为敲门砖。尽管他们都一个个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批孔的这个战斗任务，不能忘记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当前，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 反对党八股

## 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

乐 英

一九四二年，在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党八股时，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拿老八股同王明之流的党八股作了对比，说明党八股就是老八股的继续和发展。今天，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把老八股与党八股联系起来批判，弄清党八股与老八股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为什么批林一定要批孔。

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是拿党八股做他们的宣传工具，为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开历史倒车制造舆论。党八股又称洋八股、新八股。它虽然披上了洋和新的外衣，看起来好象是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新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党八股在思想根源上同老八股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反对党八股，就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

所谓老八股，就是孔老二的那套教条。孔老二的老八股，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反动统治者要人们读八股文，做八股文，为的是要使人们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孔老二的教条。你们要做文章吗？那就只能在一定的僵死的程式里变换些字句来阐明所谓圣经贤传中的道理，也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正式规定八股取士的明朝就给八股文下了一个明明白白的定义：“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做这种八股文，在形式上一定要拘守什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一套僵死的公式，在内容上只能把什么孔夫子孟夫子之流的那些陈腐不堪的教条搬来搬去。谁如果发挥自由思想，不照此办理，那就是反对圣人，就是违反了“国法”，犯下了大罪。《红楼梦》八十四回中记载贾宝玉做八股文，把孔老二的话作了改动，遭到大观园中的孔夫子贾政的责骂，就很能说明八股文究竟是什么东西：教贾宝玉读四书五经的那个冬烘先生贾代儒，从孔老二的经书上搬来一句什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给贾宝玉做八股文。贾宝玉破的题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贾代儒却将“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贾政为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十五有志于学”这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功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万万改动不得。贾宝玉在承题中写的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

之，不亦难乎？”贾宝玉这两句话颇有点“非圣”的气味，当然要使贾代儒、贾政更为光火了。贾代儒挥动刀笔把贾宝玉这些话砍个精光。贾政更是气得连声大骂贾宝玉“不但是孩子气”，而且“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你看，孔老二的活连一个字也动不得，人们只能在孔老二的老八股中做文字游戏。如果人们都照此办理，那里还谈得上思想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啊！就是这种僵死的八股，多少年来把一些人的思想禁锢在反动的孔孟之道中。那些信奉孔孟的文人学士，一天到晚摇头晃脑的读诗云子曰，之乎者也，越读越无知，越读越麻木。鲁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受八股毒害的人“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他在《孔乙己》一文中，就刻画出孔乙己这样一个受孔老二教条毒害、抱着老八股默默地死掉的典型人物。这个人开口诗云，闭口子曰，就连小朋友向他讨茴香豆吃，他也要摇头晃脑地说“多乎哉，不多也！”如果人们都被孔老二的教条麻痹到这等地步，如果人们都死命地抱着老八股不放，不用新的、革命的观点代替老八股，不用适合新形势的理论去观察世界，那就只能象鲁迅所说的，大家唱着“老调子”，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灭亡。历代反动统治者尊孔丘，搞那些“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的千篇一律的“老调子”，其目的也就是要压迫新事物的成长，反对社会变革，搞复辟，搞倒退。

无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就对孔老二的老八股、老教条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打倒孔家店，就是我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开展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斗争。这次运动比较充分地揭露孔老二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一个极大的功绩。但是孔老二阴魂不散，到后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被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改头换面的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从反对老八股到陷入洋八股、洋教条，从生动活泼的文风转为搞死硬僵化的东西，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这种思想上的倒退，文风上的倒退，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风上的反映。文风的问题从来就是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老八股是为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开历史倒车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那末，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党八股就是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搞复辟倒退、搞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尊孔，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在文风上就必然要搞孔老二那套死硬僵化的八股，搞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把党八股同老八股结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洋八股、洋教条即党八股，就其思想体系来说，是直接同老八股相联系的，是孔老二的老八股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在马列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们要公开搞孔老二那套老八股已是不行了。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妄图把马列主义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毫无生气的教条。他们把党八股与老八股结合起来，反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至

明这个最大的尊孔派，就竭力鼓吹“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搞的那套开“中药铺”、甲乙丙丁、罗列现象的东西，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同老八股、老教条完全一致的。这种文章拘守僵死的框框，在内容上不反映客观实际，不反映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斗争，而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是地地道道的八股文。那么，王明为什么要唱这种八股调？他写这种文章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的。他的那种文章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而且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象个流氓无赖，才不好看呢！“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明搞这种八股调决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用这种东西使人们脱离革命的实践，为他宣传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提供方便。王明如此，林彪这个孔老三的忠实信徒也是如此。林彪搞的那套什么“最、最、最”，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也是一种八股文风。他搞这种空空洞洞、含糊糊糊的文字游戏和概念堆砌，同样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用这种东西来招摇撞骗，掩盖他的修正主义面目，用这种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孔孟之道，开历史倒车。

我们把党八股与老八股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党八股就是批孔的继续，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学。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是尊孔派。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的文风，都是与孔老三的老八股、老教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批判党八股是批老八股的继续，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如果不批孔，不挖掉他们的思想老根，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鲁迅说得好，“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我们扫荡老八股、党八股，把这些东西打倒了，那就是对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个怪物原形毕露。

老八股、党八股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文风。从历史上看，但凡一个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这时他们的文风也是生动活泼的，也是反映前进的、革命的东西。可是，当他们从革命转化为反动，从进步转化为腐朽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是一条阻碍社会进步，开历史倒车的政治路线，这时他们在思想上、文风上也就必然要复古倒退，搞死硬僵化的八股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代表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是腐朽的、垂死的力量。他们手里没有真理，不敢面对客观实际，只能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所以他们必然搞晦涩难懂、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必然要拿孔老三的老八股、老教条做他们的宣传工具。

毛主席指出，“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批判孔老三的老八股、老教条，批判为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那种腐朽不堪的文风，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 从来就没有有什么“先哲”

裘 实

“先哲”，这是历代尊孔派对孔老二的称呼。《论语》中就把孔老二说成是什么“天纵之圣”。后来的反动统治者又给孔老二戴上什么“大成至圣先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这一类闹得可怕的头衔。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也跟在反动派屁股后面鼓吹什么神秘的“先哲”。

天下果真有什么不要参加实践的“先哲”吗？对这个问题，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历来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

一切唯心主义者总是竭力宣扬“先哲”之类的“天才论”。所谓“天纵之圣”的孔子，不用说是主张有“先哲”的了。他把人的智力分成几等，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而且强调“上智”和“下愚”是永远不变的。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说什么世界上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天生什么都懂的“良能”、“良知”。林彪这个骗子也和孔孟唱着同一个调调，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天生聪明的“天才”，一类是天生愚蠢的“卑贱”者。并且认为这两种人的脑袋“有天壤之别”，而他自己的脑袋就“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灵”，还要加上“特别”两个字，当然是归于“先哲”、“天才”一类了。但是，任凭唯心主义者闭着眼睛瞎说，没有的东西偏要说成有，总是枉然。即使是被反动阶级吹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孔老二，也决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指出，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被匡人所围，孔子惶惶如漏网之鱼，失散了的颜渊后来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早死了”。如果是“先知”，为什么连颜渊的死活都不知道呢？还有一次，孔子到陈国，到处碰壁，无人理睬，“七日不火食”，活象一个叫化子。如果是“生而知之”，为什么连饭也混不到吃呢？这不是对那些“先哲”们的绝妙讽刺吗？

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先哲”。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家们就曾经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反对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如汉朝的王充就曾明确驳斥了孔孟宣扬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论，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并且说，“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这就根本否认了有先天的“天才”。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不承认有什么先哲。早在四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深刻地批判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也当成孔夫子一样的“先哲”的谬论。毛主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

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在这里，毛主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了唯心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根本否认有“先哲”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就是说，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不是“爹妈给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人的头脑在认识过程中只是一个加工厂，这个加工厂的“原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孔老二自说是“生而知之”，实际上极其无知，学生问他如何种田、种菜，他都不懂，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过的是四体不勤、不劳而食的寄生虫生活。因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离开了实践，就是你的脑袋再“灵”，也决不能获得任何知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认识不仅要受到实践条件的限制，而且，在阶级社会中，尤其要受到阶级地位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客观世界反映到人的头脑里，头脑这个加工厂怎样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以及加工出什么样的思想“产品”，这都和人的阶级地位和所具有的世界观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人的认识不仅具有实践性，而且具有阶级性。孔老二这个“所知万世”的“圣人”，却偏偏要逆时代的潮流而动，为即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奔走呼号，最后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林彪这个脑袋“特别灵”的“天才”，却偏偏要在社会主义到处胜利前进的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的本领不大，而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都是代表了没落反动的阶级，因而总是干出那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蠢事。相反，历史上一切革命的阶级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并不是因为具有什么“先知先觉”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是同历史发展的方向一致的。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决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先哲”，而是由于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领袖及其思想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有着血肉联系。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积极地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用科学的方法，总结群



众的实际斗争经验，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才创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时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林彪一类骗子，用“天才史观”来否认无产阶级领袖参加革命的实践的作用，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革命实践的关系，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诋毁！

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我们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说成是“先哲”，目的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地批判了那些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本本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个别词句，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却一无所知，不懂得中国工人、农民以及各阶级各阶层的实际情况，而在那里闭着眼睛指导中国革命，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而从思想根源来说，“本本主义”就是犯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毛病，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孔子、林彪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否认人的知识和才能来自革命实践，其目的还是否认亿万革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孔孟不是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吗，林彪一伙不是也说“一炬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吗，在他们的心目中，广大劳动人民都不过是需要他们来“震聋发聩”的“后知后觉”的“群氓”，而只有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天才”才是拯救人类的“救世主”。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揭露过这种反动唯心史观的本质，是要人们相信“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百多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要翻身解放，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和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那些剥削阶级的“先知先觉”的“天才”们，所能给的只能是饥饿和奴役。镣铐和屠杀。无产阶级要彻底打碎旧世界，消灭那些吃人的“毒蛇猛兽”，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经过自己的政党，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胜利前进。让我们把革命的炉火烧得通红，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

# 从东北解放战争 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 子 道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今天，揭露和清算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反对和破坏运动战方针的罪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识破《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这本小册子中所炮制的弥天大谎，戳穿林彪的所谓“天才军事家”的画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军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接着，毛主席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当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毛主席进一步总结了我军进行运动战的丰富经验，并且针对战争形势的发展，在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明确规定：“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毛主席这一系列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但是，林彪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正确方针。他畏敌如虎，消极避战，热衷于搞消极防御，背着党中央抛出和推行了一条“硬拚仗”的错误方针，说什么“打成歼灭战这个固然算胜利；但是即使打成击溃战、对峙或两下撤退的仗，只要大量杀伤敌人，也同样算是完成任务，算是胜利”，公然鼓吹要同敌军拚消耗，打阵地战、消耗战。毛主席、党中央针对林彪反对运动战方针的错误，明确指示东北前方不要攻坚，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采取运动战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林彪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拒不执行。直到一九四八年，他还继续鼓吹打阵地战比打运动战“合算”的谬论，坚持反对运动战方针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三种的方针。”这是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一项根本原则。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历史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无比正确性。如果按照林彪的一套去做，把阵地战作为第一位的方针，它的结果，决不会是象他自吹的什么“包打胜仗”，而必然是包打败仗。

运动战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流动性和进攻性是它的基本特点。它表现为我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大踏步

地进退，在战役和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即以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包围敌人，从战场的外线上对敌举行速决的进攻战，确有把握地歼灭敌军。正是由于运动战的这种进攻性和流动性，在战略战役的指导上，必须善于调动敌军，创造和捕捉战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打”和“走”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一系列指示，精辟地阐明了运动与歼敌、走与打、后退与前进的辩证关系。毛主席深刻指出：“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我军的“走”，是以“打”为前提的，是为了更好地“打”才“走”的。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

但是，林彪从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出发，以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打”与“走”的关系，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用右倾逃跑主义来冒充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战争一开始，毛主席就根据全国的总形势，确定了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从陕甘宁及华北等解放区调动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同东北人民武装汇合，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余万人的人民军队。当时国民党由于在抗战时一直龟缩在峨嵋山，兵力来不及调遣，在东北尚没有一支正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军队在秦皇岛登陆后开始向东北发动进攻，但只有两个军，兵力并不强。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指令要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的歼灭。但是，林彪却把东北的革命形势看成漆黑一团，污蔑东北我军是根本不能打仗的军队，一再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时机，使敌军轻易地占领了锦州。此后，国民党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对我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沈阳周围地区，并沿沈长铁路北上进犯。针对这一形势，毛主席、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多次指示林彪，要控制住长春、哈尔滨一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好一两个胜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而林彪却被气势汹汹、色厉内荏的敌人所吓倒，以种种借口不执行中央的作战指示。相反，却在沈长线上的某城市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阵地战。接着又轻易地放弃了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致使敌军得以深入我东北解放区。更有甚者，林彪竟然还提出“放弃哈尔滨”，准备“打游击”的谬论。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严厉批评下，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才刹住了他的退却逃跑，扭转了东北的局势。

林彪的这种只走不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是同毛主席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完全相对立的。毛主席在论述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时，早就尖锐地指出，运动战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强调“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但是林彪及其死党竟把退却逃跑吹捧成是实行运动战的方针，胡说什么，“林彪在东北实行战略撤退，也正是依据毛主席所规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明明是退却逃跑，却美化成为运动战和歼灭战，真是无耻至极。

在战争中，敌我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对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守或夺取城市、地方。有时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正是为了换取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利。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集中兵力，以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敌人。但是，林彪在由锦州地区向哈尔滨一带退却中，消极避战，拒

不执行中央指示，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在退却中又不敢抓住战机，实施反击，不组织有力的运动战、歼灭战。这样一来，不仅坐失战机，没有大量歼敌于运动之中，同时又丢失了地方和城市。如果按照林彪的这一套“运动”下去，整个东北解放区都得被“运动”掉。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上，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英勇歼敌，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和破坏，使得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些方面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只有在林彪的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受到了批判和纠正之后，才使我军又胜利地大踏步地前进了。

当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毛主席指挥全军在更大的战区和更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而林彪却仍然顽固地以右倾保守主义对抗毛主席的运动战方针。一九四八年秋，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在东北战场上，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已超过敌军，敌军龟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城市中。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毅然决定从辽沈战役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开展战略决战，指明东北我军的作战方向应指向北宁线，“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这样，我军在攻克锦州以后，就能“关门打狗”，全歼东北的敌军。同时，在北宁线作战的时候，长春、沈阳的敌军为了救援锦州，从原来据守的城市中被吸引出来，有利于我军乘其在运动过程中予以彻底歼灭。

但是，林彪从资产阶级右倾军事路线出发，看不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不敢大踏步前进到敌人侧后作战。他借口到北宁线作战离后方太远，锦州难攻等等，一再顽固地坚持将主力留在北线攻打长春。后来在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下，才不得不勉强部署部队南下作战。但就在这时，林彪仍阳奉阴违地把主力部署在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春、沈阳出来之敌。毛主席坚决制止了林彪的这一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如果我军以主力放在打援上，长春、沈阳之敌可能因受威胁而不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攻锦的兵力过小，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将乘机收缩阵地，变得不甚好打而我又不得不打，结果费时费力，弄得不好有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的可能。毛主席再次强调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排除了林彪的干扰。最后，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军主力进入锦州地区，完成了攻打锦州的作战部署。正在这一关键时刻，林彪又提出了回师北上攻打长春的“建议”，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破坏“攻锦打援”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发现了林彪的企图后，严厉地批评和制止了林彪的错误主张，坚持贯彻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终于胜利地攻克了锦州，并全歼了沈阳来援之敌。事实证明，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的资产阶级右倾军事路线的结果，是毛主席的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一定的战略战术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决定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林彪反对运动战的正确方针，推行阵地战、消耗战和退却逃跑主义，是他在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东北解放战争刚开始时，林彪就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兵大举进攻东北的时

候，林彪又伙同彭真炮制了一个什么东北决议，狂热地鼓吹“东北和平已成为必然前途”的谬论，散布和平幻想。林彪甚至公开宣称“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使东北与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当一九四六年春蒋军向沈长线上的某城市发动进攻，我军进行保卫战时，林彪竟然宣称什么这一仗是“和平前夜的最后一战”。正是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他消极避战，胡说什么如果积极打击敌人，就会“吸引很多国民党军队到关外来”，“这对东北不利”。他在敌军进攻面前，提出了打“硬拚仗”的错误方针，主张同敌人拚消耗，打阵地战、击溃战，以军事上的拚命主义掩盖其在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由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的。林彪在当时对东北战场形势、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的估量，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主席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和战争的前途，明确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对于东北的局势，毛主席极其深刻地指出：虽然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但“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后来全国战局和东北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而林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敌人的军力和经济力的暂时和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他一方面惊呼东北敌军“战斗力强”，“一个师可以顶几个师用”，“很难打”，另一方面污蔑“东北战争条件不成熟”，我军打败国民党军缺乏条件。林彪如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的王明之流那样，“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战争开始时，他主张消极防御，打消耗战、阵地战，当战略决战的时机已成熟时，他不敢南下到敌人侧后作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这都是由于对形势的唯心主义估量而来的，是右倾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方针和唯武器论是互为表里的。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竭力鼓吹武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谬论，胡说什么“技术问题决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一切问题”。他白白声声惊呼东北敌军“火力强”，“铁路多”，“控制机动列车，行动方便”，“在技术上强过我们”，在他看来，我军根本无法进行运动战和歼灭战。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唯武器论，是军事思想中的机械论。毛主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我军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林彪否定人民力量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迷信武器装备，在作战方针上必然导致右倾机会主义。

林彪自称“天才”，他的死党吹捧他是什么“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非凡的天才”，但是，剥开画皮看本质，真面目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历史证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正确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我军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结果，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将会推动我们对毛主席军事著作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形形色色政治骗子的能力。

# 戴季陶主义与孔孟之道

桑 杰

是反孔还是尊孔，从来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战线上，主要表现为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 (一)

戴季陶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蒋介石十分亲密的反革命伙伴。他们俩原来一起在上海开交易所，做投机生意；后来又一起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在革命阵营中窃取了重要职务。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们表示坚决拥护国共合作，革命调子比谁唱得都高。但是，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兴起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就逐步地暴露出了他们的狰狞嘴脸。

孙中山一死，戴季陶就在追悼孙中山的挽联中把孙中山说成是：“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他还撰文说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二千年来直承中国正统文化思想而发扬光大之的第一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无论是孙中山或者是国民党，都是孔孟道统的继承者，从而为他的歪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作了舆论准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打出了“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的招牌，为日后的反共留下了伏笔。接着，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本黑书，全面地系统地宣传了反动的孔孟之道，别有用心地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说成是当代的孔孟之道，妄图利用孙中山当时的声望来替孔孟之道即复辟之道鸣锣开道。七月，戴季陶又接着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公开地提出要用他所曲解的“孙文主义”来改造国民党，阴谋破坏国共合作，以利于他放肆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戴季陶所提出的这一套理论和政治主张，在当时被称为戴季陶主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最初的表现形态。

尊孔就是复辟倒退。戴季陶利用孙中山的招牌来大肆贩卖孔孟之道，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民主革命。他说：“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中国以来”，一切革命派都反孔，但是他从这个事实中竟引出荒谬的结论说，这“证明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只有孙中山继承了孔孟之道，才是保持“民族的自信”。这完全是奇谈怪论。孙中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并不是因为他反孔而失去了“民族的自信”，相反，恰恰

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能同孔孟之道实行彻底的决裂。孙中山接受历史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但是，蒋介石和戴季陶却认为旧三民主义不仅不应该前进到新三民主义，而且应当倒退回到孔孟之道去。

不仅如此。戴季陶还叫嚣，只有保持他所鼓吹的所谓“民族的自信”，才算是“民族主义”；同时，他又要求在孔孟之道的“基础”上，“尽量的接受现代的欧洲文化”，来“完成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好一个“尽量的接受”！什么“现代的欧洲文化”，还不明明白白指的帝国主义文化。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复活孔孟之道，目的是为了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革命。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又是亡国之道。尊孔读经的结果必然是投降卖国；而那些尊孔头子最后也都无不一一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汉奸、卖国贼，这是中国近代历史所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戴季陶的所谓“民族自信”，归根到底，是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复辟分子打气，鼓励它们应该有“信心”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

为了实现这种反革命目的，戴季陶挥舞孔老三的“仁”的破旗，攻击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还宣扬“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谬论不仅鼓吹阶级调和，而且把反动阶级冒充为革命力量。他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实行那种“仁爱”，就会使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为工农利益去“革命”，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他还厚颜无耻地说：那种“革命”会是“利他的”，比工农“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要好；而国民革命就应该是那样一种“联合各阶级的革命”。这一下可露了马脚。原来戴季陶认为工农根本不应该起来革命，因为这是“利己”的，而只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代替工农所进行的革命才是“利他的”。这完全是个弥天大谎。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根本不可能搞革命而只可能搞反革命。工农大众如果听凭这种所谓“革命”实现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被陷进血海中去！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戴季陶满口的仁义道德，是为了从理论上搅乱阶级阵线，颠倒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以便他们阴谋篡夺革命的领导权，用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

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精神武器。这两人一文一武，互相配合，纠集了国民党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 (三)

蒋介石、戴季陶一伙和他们所信奉的儒家祖师爷一样，是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极善于搞两面派活动。就在他们已经开始了破坏国共合作

的阴谋活动之后，回头上却仍还是摆出了一副“反对”右派的样子，有时甚至装得比左派还要“左”。而孔孟的中庸之道，在这时就成为他们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的主要理论武器。

貌似不偏不倚，平允、公正之状可掬，这就是戴季陶在当时的画像。他胡说什么自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出现了“互相排拒”的“左右两种极端”，而他却是不左不右地同时反对了这两种倾向，花言巧语，蛊惑人心，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为了实行“中庸之道”而不惜忍受着左、右两面来的打击的殉道者的样子。

其实，“中庸之道”从来不“中”。这只要看一看戴季陶之流的实际主张就可以明白了。什么是他所反对的“左倾”呢？那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在他看来，讲唯物史观就是“左倾病”，必须坚决反对。他要当时那些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完全是妄图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因此这根本不是反对“左倾”，而是主张极右。什么是他所说的“右倾病”呢？那就是在他看来国民党内“随时都看见有一群的私人结合，不看见有一个主义的团体”的现象。戴季陶高叫反对“右倾病”的真正目的，是要国民党中的各种右派势力不要派别林立，各树山头，而要集合到以蒋介石为头目的“一个主义”的下面，共同反共。这明明是在树起了一面统一右派的黑旗，号召全体反革命徒众一起向革命派进攻，又哪里是什么反对右倾呢？戴季陶摆出一副不偏不倚、折衷至当的面孔，实际上完全是骗人的。中庸之道是骗人之道，历来为一切政治骗子所信奉。蒋介石、戴季陶这一伙在当时被称为新右派。他们与老右派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极善于伪装，在当时虚伪地打出了中庸之道的旗子，较之老右派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

假的总是假的。既要伪装，就难免不露出马脚。戴季陶把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说成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并以此为借口，主张取消国共合作，分裂统一战线，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这就清楚地暴露了它的极右实质。国共合作是以三大政策为特征的新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只要国民党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就没有什么“共信不立”。戴季陶要求国民党实行他所曲解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正是证明他本来就是民主革命的敌人，和三大政策毫无“共信”可言。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把已经成为各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国民党，改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为此，他正式提出了他的组织纲领，摆出一副人莫予毒的架势，疯狂地叫嚷：“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而且，他所要的国民党“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这里，蒋介石要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党的面目不是已经狰狞地表现出来了么？这就是中庸之道的实质，哪里有一点不偏不倚的影子呢！

明明是反革命的右派，却偏要伪装成既反对左派又反对右派的样子，目的之一是为了诱骗那些对中间道路充满幻想的人们。当时的中等资产阶级，就深受戴季陶主义的影响，对于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怪诞主张十分欣赏，满心以为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走去，就可以左右逢源，建立起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但是，蒋介石怎么会去反对帝国主义呢？他本人就是帝国主义的一条最大的走狗。因

（下转 26 页）



# 从青铜器看吃人的“礼治”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巡礼

冯丹枫 茅伯科 翁长松 黄龙珍

踏进上海博物馆那一间间宽敞明亮的陈列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件件制作精巧、纹饰绮丽、风格独特的礼器、乐器、兵器等各种类型的青铜器。看看这些精湛无比的艺术品，我们不由联想起几千年前，多少奴隶被迫站在炽热的炉火旁，挥汗如雨地把一罐罐“将军盔”（坩埚）里的铜液，倒进了范模，再经过加工磨光，才创造了这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青铜器熔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闪耀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千百万奴隶创造了人类世界。然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却无偿地占有了奴隶血汗劳动的成果。青铜器成了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成为奴隶们苦难生活的标志。片片青铜，斑斑血泪，青铜器虽然无声无息、寂默不语，却以它们自身和那难以磨灭的铭文，愤怒地控诉了“礼治”的残暴，强烈地抗议着“礼治”的虚伪、腐朽和反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同中国奴隶社会的兴衰相始终的，它是奴隶社会“礼治”的象征。青铜器本身就表现了奴隶制尊卑有秩的等级关系。青铜器中的所谓礼器，特别是鼎、簋，就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它们被用来记载“天子”命令、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锡命、训诰臣下等等所谓“大事”。传说夏禹时曾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国宝，传为重器。成汤灭夏，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灭商，又把九鼎迁徙到了洛邑去。我们再来看青铜器的铸器过程，可以说是“礼治”的形象体现。铸器前要有一整套礼节仪式。天蒙蒙亮的时候，在都城的宗庙或皇宫，由“王”下达“策命”，然后把奴隶、土地、服饰、车马、兵器赏给有功的贵族。原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斤重的《孟鼎》的铭文，就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在宗周赏赐贵族孟以奴隶和土地（“受[授]民受[授]疆[疆]土”）的事实。赏赐以后，便开始铸器。“策命”的内容就成了铭文的主题。青铜器铸成后端端正正安放在宗庙内，象征着贵族的世袭特权，作为神圣的礼器享受贵族子孙的供奉。

青铜器所反映的“礼治”，决不是徒具形式，而是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钟鼓齐鸣的“礼”治的基础，是奴隶们的斑斑血泪、累累白骨。孟鼎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赐给夫奴隶主孟“人鬲”（奴隶）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他的“夷司玉臣”（殷人管理夷人的王家奴隶）十三人，以及从殷人接收过来的奴隶一千零五十八人（易[赐]女[汝]邦鬲[司]三[四]自[伯]人鬲自豳[豳]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赐]尸[夷]鬲[司]玉臣十又三百[伯]人鬲千有五十夫）。这桩事实清楚地表明：只要周天子的一道“策命”，就不知有多少奴隶连同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打进暗无天日的地狱！奴隶不仅可以赏赐，而且可以充当抵押、交换的物

品。周孝王时的《智鼎》铭文记载：一个叫智的奴隶主用“匹马束丝”即相当于“百等”的代价，向另一个奴隶主买了五个奴隶。这就是说，五个奴隶才只抵一匹马加一束丝，一个奴隶只值三十等，还不到五十文铜钱！遇上灾荒，五个奴隶竟只抵禾三十秭（稻三十捆）。奴隶制的“礼治”规定了“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劳动者不过当作有声的工具，和当作半有声的工具的动物”。

奴隶主的“礼治”建立在对奴隶的残酷经济剥削基础之上。不管是赤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成千上万的奴隶都被束缚在“公田”上披星戴月地劳动。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奴隶主，奴隶主的谷堆堆得象小岛，象山峰，他们准备了上千座谷仓，配备了成万个箩筐，装满大米、小米和高粱（“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诗·小雅·甫田》）。而终年劳累的奴隶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牛马生活。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民膏”。古色斑驳的青铜器是奴隶主嚼肉吮血的铁证。绝大部分青铜器都是奴隶主在祭祀、宴乐时用的礼器、乐器和酒器。请看，那圆腹两耳三足或者长方四足的鼎，是盛肉食的器皿；那圆腹圈足的簋，是专门盛放大米饭的器具；那精美玲珑的爵和斝，是盛酒和温酒用的饮器。奴隶主们在宫廷里珍着杂陈，歌舞达旦，作“长夜之饮”。件件青铜器都铭记着奴隶主骄奢淫佚的罪行。据《周礼》规定：诸侯约下大夫吃饭，要用四十五只菜饌；约上大夫吃饭，要用五十一只菜饌。奴隶们的胥血被烹调成佳肴美饌盛放在各式青铜器皿里，供那些脑满肠肥的奴隶主们咀嚼和品味。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貂裘虎皮。周懿王（一说周孝王）时器《大师虘簋》铭文记载说：周天子命令大臣宰昏代自己赏给贵族大师虘虎皮衣裘一件（“王乎[呼]宰昏易[赐]大师虘虎裘”）。周宣王时器《鞞伯簋》也记载，由于贵族鞞伯辅助益公征眉敖有功，周天子赏赐他貂裘一件（“王命中[仲]到鞞伯自[伯]虘[貔]裘[裘]。王若曰，‘……易[赐]女[汝]虘[貔]裘[裘]’”）。奴隶主锦衣玉食，而奴隶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豳风·七月》），最后都不免冻饿而死。孔老二梦寐以求的“周礼”，就是这样一幅人吃人的残酷图景。

现在，请再看那些陈列着的寒光闪烁的青铜兵器吧。那些长长短短的戈、矛、剑、戟，各种长条形刃、兽头刃和众多的矢镞，尽管已经是铜锈斑斑，或者是刃卷锋裂，但它们都曾溅满着奴隶的血迹，是奴隶主屠杀奴隶的铁证！周穆王时制定的奴隶主法典《吕刑》，包括了三千多条刑法。奴隶主稍不遂意，就对奴隶滥施酷刑，有的被斩脚，有的被挖眼。在奴隶主的祭坛和葬礼上，更暴露了“礼治”杀人的本质。地下世界是地上生活的模写。在陈列室里复制的安阳武官村奴隶主大墓的模型里，铺满了奴隶的累累白骨，这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奴隶社会的缩影。一个奴隶主贵族死去了，在墓口竟屠杀了七十九名奴隶作为殉葬，其中有三十四人被活活地砍下了头！这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礼治”图景，孔老二竟对它推崇备至，心向往之，狂吠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妄图实现“克己复礼”的迷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在叫嚷“克己复礼”，妄图在中国复辟黑暗、血腥的剥削制度，这完全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伙政治小丑的折戟沉沙，粉身碎骨，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怀着愤激的心情离开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那斑斑青铜，篇篇铭文，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它们剥开了“礼治”的虚伪外衣，揭露了“礼治”杀人、吃人、骗人的反动本质。我们决心拿起笔，作刃枪，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终生！

（本文作者是上海永胜金属冶炼厂、上港六区、毛巾五厂、蘆海农场的青年工人）

#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 赞工人理论学习班

### 短评

中国哲学史工人学习班座谈会纪要是一份生动的材料，值得一读。参加这个学习班的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他们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写大批判文章，生气勃勃，富有战斗力。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大批判的积极分子，涌现出了大批工人理论学习班，我们应该热情地拍掌欢迎，为它的成长大喊大叫，鸣锣开道。

办工人理论学习班，使工人群众获有机会在学习班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法家的著作，这是提高工人思想理论水平，推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中国哲学史学习班的同志，就是通过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究了一定数量的史料，进一步认清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历史学习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就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了青铜器这个老古董，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的反动性。别看林彪、孔老二装腔作势，故作艰深，工人群众只要认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完全能对它们做到批深批透。让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什么“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吧，事实已经宣告了这些谬论的彻底破产。

办好工人理论学习班，培养工人理论队伍，这不仅是当前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理论建设，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有效保证。工人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一切的责任，就一定要百倍地加强整个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理论队伍。马列主义从来是在斗争中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阵地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加强。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就是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最好学校。实践证明，在这场斗争中，凡是重视抓了这项工作的单位，那

里就会在斗争中涌现出大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逐步地形成一支理论队伍，进一步推动那里的批林批孔胜利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当成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学习理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工人理论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工人理论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这种理论战线上繁荣的景象，十分令人鼓舞。革命的知识分子要适应这种革命形势，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与工人群众共同学习、共同批判，以提高我们整个理论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我们要欢迎革命知识分子帮助工人阶级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要团结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鼓励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在斗争中团结使用改造他们，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培养马列主义的理论队伍，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事业，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头等大事，不光工厂企业要重视抓好这项工作，其他各条战线都应十分重视抓好这项工作。

---

(上接 22 页)

此，反帝是假，反共是真。这个大卖国贼为了清除卖国道路上的障碍，什么无赖手段都会使出来。戴季陶主义一出笼，蒋介石便公开宣称，必须信奉他们那个牌号的“孙文主义”，“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不为同志，便为仇寇”。这种杀气腾腾的语言，清楚地暴露了隐藏在他们的中庸之道背后的狰狞嘴脸。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历史本身已经作了清楚的见证。自从蒋介石等一伙人宣扬戴季陶主义之后，各种反共力量就都先后集合到蒋介石那里去了。他们一起干着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勾当，叛变和出卖了革命。当时党内投降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蒋介石、戴季陶复活孔孟之道毫无警惕，抱着宽容放纵的态度，大搞其“忠恕之道”，使蒋介石反动派得以售其毒计，阴谋得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地被淹没在反革命大屠杀造成的血海之中，使中国人民陷入二十二年的法西斯专政的奴役之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它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蒋介石、戴季陶的反革命事业，重新抬起了孔孟之道这面破旗，目的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但是，历史已不会重演了。林彪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留给我们的是又一个反面教员，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批孔斗争的伟大意义，自觉地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 我们工人能够学好哲学史

## ——中国哲学史工人学习班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期中国哲学史工人学习班。这里发表的是学习班结束后一次座谈学习体会的记录。

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是两个钢铁厂的青年女工。她们以生动的事例谈了自己是怎样在斗争中提高对学习哲学史的认识的。

茅森妹(上钢五厂工人)。

我是开行车的，中国哲学史从来没有碰过。我们平时在厂里，到东到西，车来人往，热闹惯了，现在要坐下来啃那些纸头发黄的古书，真坐不定。这些老古董究竟与现实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开始，我真有点想不大通。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看到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那许多黑话，我开始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对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失觉阔、失笨阔。为什么他要装模作样地谈论孔子、孟子，东拼西凑地搜集孔孟的言论？原来，孔孟之道讲的是复古倒退，宣扬的是复辟之道，卖国之道。难怪历史上要复辟倒退的反动阶级都喜欢它。我党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都要从孔老二那里取经学道。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在理论上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只能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就拿林彪十分崇拜的朱熹来说，是个虚伪透顶的道学先生。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林彪不但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还狂

热宣称“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朱熹的那套“待人哲学”就是虚伪残忍的反动理学，它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反动理学熏陶下的道学家们，都是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庄严虔诚，骨子里阴险欺诈、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林彪吹捧那套虚伪残忍的“待人哲学”，目的是为了搞两面派的阴谋活动。弄清了这些道理以后，我写了一篇《评朱熹的待人哲学》的文章，投入批林批孔斗争。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斗争实践，使我认识到，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读一点中国哲学史，是很有必要的。

陆金兰(上海冷轧带钢厂工人)。

我同茅森妹同志一样，也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学习哲学史的重要性的。去年上半年，我听市里有关部门正在举办哲学史讲座，争取到了一张旁听证，每星期一去听半天，坚持了半年时间，从头到尾把它听完了。这次又有机会参加脱产五个月的哲学史学习班。这体现了党对我们工人学理论的重视。

在学习过程中，我翻了好几本哲学史

的书，发觉那些书上，讲这个流派、那个流派，却都没有能和儒法两派的斗争联系起来，对于儒家和法家在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就说孔老二和秦始皇吧，不少哲学史、历史书对这两个人物的评价却总是颠倒的。有的书上吹孔老二是“伟大的教育家”，而对秦始皇却百般咒骂，有的书全篇都是吹捧儒家、贬低法家的，还说什么“法家出自于儒家”，完全抹

怎样结合批林批孔斗争学好哲学史？崔继峰和郭企元同志的体会是：必须紧紧抓住儒法斗争这条基本线索，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崔继峰（上海内河装卸三区工人）：

我通过学习哲学史，体会最深的是，要把哲学斗争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真正学懂、学好。《文汇报》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学一点哲学史，开辟了《读点中国哲学史》专栏，要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写一篇介绍魏晋玄学的文章。开始我没有同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结果被那末些“有”啊、“无”啊、“虚”啊、“玄”的，弄得昏头昏脑。看了半天，还不知要害在哪里。后来，我们就着重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特点去分析，抓住一些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论点，放到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分析。这样，终于撕去了“玄妙”的外衣，看清了玄学是魏晋反动统治阶级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新形势的需要，把唯心主义儒、道学打扮得更精致，以便在哲学上故弄玄虚，继续迷惑人。这是一切没落腐朽的阶级在穷途末路时惯用的伎俩。通过对玄学的分析，使我认识到，哲学上各种思潮、学派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总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的。这次写批判魏晋玄学文章的过程，使我得到一点体会，头脑中有了阶级斗

争这根弦，再玄的哲学也会感到不玄。从这些书的尊孔反法倾向，使我看到了要在哲学史领域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毒素，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它，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多次号召要培养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今天我们有机会系统地学一点哲学史，一定不能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学习、研究。

争这根弦，再玄的哲学也会感到不玄。

郭企元（上海吴泾热电厂工人）：

哲学史上各种流派和人物很多，过去我们学习的时候，总是单纯地记住一些人名和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没有从哲学与现实斗争的联系上去思考问题，这样的学习作用不大。批林批孔斗争的现实，使我越来越感到原先的学习方法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我逐渐认识到，哲学史上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同儒法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比如商鞅、荀子、韩非、王安石等，都是唯物论者。他们的反儒斗争，在哲学上表现为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所以，不搞清楚儒法两家的斗争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哲学史。这以后，我在学习哲学史的时候，就紧紧抓住儒法斗争这条基本线索，分析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用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各种学派和思潮的斗争。我把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来看，一个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一个是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再

一个就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然后再看这些历史转折时期有关儒法斗争的历史资料，着重注意儒法斗争形势发生了什么演变。我发现，伴随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儒法论争总是表现得特别激烈，论争的实质又总是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变革，也就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而展开的。战斗需要学习，学习是为了战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写了批判董仲舒和评介王安石的两篇文章。董仲舒是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是汉代的孔老三。

要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就得花工夫去熟悉和研究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批判它。下面两个同志着重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陆金兰：

我体会到，要弄清林彪一贯尊儒反法的阶级实质，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就得下工夫去熟悉它、研究它。为了弄清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我选读了《论语》、《孟子》等反面教材。接触这些东西，的确也碰到不少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想到当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曾经讲到杜林庞杂的体系就象一个酸果，但他还是下决心把它啃下来。今天，我们在研究批判反动的孔学时，也应该学习革命导师啃酸果的战斗精神，克服困难，用马克思主义去战胜它。古文不懂，我就翻字典，和同志们一起讲论。比如，朱熹搞的论语注释中，又是大字，又是小字，又是大标点，又是小标点，密密麻麻一大堆。开始看不明白，我就多看几遍，反复琢磨，再不懂就请教老同志。这样硬着头皮看下去，就逐渐弄清了朱熹是怎样利用注释来吹捧孔子的。为了帮助自己熟悉历史，我还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其他一些历史书籍，如《东周列国志》、《史记》故事选等。我还把《论语》《孟子》的原文和报上发表的批注及一些批判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杰出的改革家，政治上积极崇尚法家。林彪对这两个人物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被捧上了天，公然号召大家向董仲舒学习，一个却遭到大肆攻击，这从他积极推崇历史上恶毒咒骂王安石的《辨奸论》、《物相公》等反动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一捧一骂，一褒一贬，充分暴露了他尊儒反法、反对社会变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开历史倒车的丑恶嘴脸，使我们更认清了林彪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分析文章结合对照起来看，又看了一些有关儒法论争的文章及资料，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背景，这样逐步弄清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这对于认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在翻阅《论语》的时候，发现有好多次孔子既讲到“亲亲”，又讲到“举贤才”，开始时我搞不懂，心想，他讲“亲亲”是宣扬奴隶主阶级的世袭世禄制度，就是说要把奴隶主阶级的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举贤才”是讲不分亲疏贵贱，有才能的人统统可以推举上来，“亲亲”和“举贤”不是矛盾的吗？后来，我把孔子鼓吹的言论和他的反革命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思考，就感到孔子所鼓吹的“亲亲”和“举贤”是一致的，它们是统一在一个“忠”字上。不少史料证明，凡是忠于奴隶制，为复辟奴隶制效劳的人，不管亲不亲，在孔子眼里都是贤才；凡是破坏周礼，主张革新的，那就对不起，都是不贤的了，孔子杀少正卯就是一例。因此，所谓“亲亲”也好，“举贤”也好，无非是要扶植奴隶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通过“举贤才”来“举逸民”，组织复辟奴隶制的

反革命集团。林彪=伙也=样，他既打出“求贤”的招牌，又说什么“亲不亲，线上分”，目的还不是为了收罗忠于他们林家父子的牛鬼蛇神，拼凑反革命别动队。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只要把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能认识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只要我们能真正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当时尊儒反法的思潮，就能不被各种现象所迷惑。黄士耀（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人）：

陆金兰同志讲的对我很有启发。我们学习、研究哲学史，当然要下苦功、花力气，但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们参加学习的七个同志都是青年工人，虽然都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历史不熟，古文不懂，领导上看到我们这种实际情况，就让几位搞哲学理论工作的同志同我们一起学习，请他们辅导，帮助提供资料，还一起讨论修改文章。有时我们回厂参加批林批孔，他们也一起去，既向工人学习，也帮助做些工作，很受工人群众欢迎。

另外，我还深深体会到，反动的孔学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在批判它的时候，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仔细分析，才能戳穿它的反动实质。例如，孔老二鼓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谬论，光从字面上看，就是说，自己办不到的事情，不要加到别人身上。这句话，如果不看它的阶级内容，初听起来好象没有错。后来，我们学

接下来发言的同志谈到，为了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作用，他们还学习和研究了法家的著作。

许增兴（上海轴承制造厂工人）：

为了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作用，我们还应该认真研究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过去，我总认为，法家嘛，就是讲“刑罚”，重“法纪”，面孔铁青，好象包公一

习班的同志一起学习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到的“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还学习了鲁迅揭露反动实质及有关论述，再联系孔老二这句黑话来进行批判，就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反动阶级当然是“不欲”的，而我们革命人民则必“施”于他们。通过这样分析，才弄清了孔老二宣扬这套反动言论，不过是恶鬼装菩萨。林彪=伙也=样吹这种谬论，目的是为了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我和郭金元同志一起，写了《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一文。通过这次写作战斗，使我认识到，孔孟之道的欺骗性，就表现在它给刽子手穿上牧师的服装。它表面上讲“仁义道德”，骨子里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表面上假惺惺地讲“爱人”，实际上恶狠狠地主张“吃人”。这套骗人的哲学，正好适应了林彪=伙政治骗子的需要。所以，我们更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剥去它的伪装，揭穿它的反动实质，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批判机会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样的人物。其实，这完全是看现象，抽掉了阶级实质。我带着这个问题，读了一些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等的著作，才弄清楚了法家的产生、法家历史地位的演变以及法家进步的历史作用。原来，法家



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他们是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主张进步阶级对反动阶级实行革命专政。这使我认识到，我们研究法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有利于我们深入批林批孔，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李海生（上海染化三厂工人）：

在如何评价法家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比如，象曹操这样一个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他在打击地主阶级豪强势力，统一祖国北方，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方面，很有有一番作为。可是，多少年来，曹操一直被歪曲成一个大粉面的奸臣。从曹操使我联想到象商鞅、秦始皇等其他一些杰出的法家代表，为什么他们在生前都是叱咤风云，死后却是毁誉纷纷，遭到恶

毒攻击和贬低？为什么林彪大骂法家是“罚家”呢？经过对曹操这个人的反复研究，使我看清楚了，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尊孔反法思潮影响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了，凡倒退者必尊孔，尊孔者必反法，这是一条规律。这样，我就写了一篇《评曹操的法家思想》的文章，从反儒尊法的角度对曹操进行了评论。现在，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何评价法家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赞同社会向前发展还是开历史倒车；是肯定革命的专政还是否定革命的专政；是肯定新生的社会力量；还是为腐朽的社会渣滓唱挽歌的问题。所以，一切反动势力都极端仇视法家，恶毒咒骂法家。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充分肯定法家的进步历史作用，把被反动派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最后，同志们表示学习班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学习，继续拿起笔杆子战斗，力争做一个能文能武的新工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李海生：

我们在学习班里，注意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给我教育很大。我们坚持比较系统地读一点书，也安排适当时间下厂，参加厂里的批林批孔活动，做些调查研究，使我们的学习和当前的斗争紧密相联。有的同志还经常回厂向工人老师傅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组织和带动更多的工人同志读点哲学史。这样，“脱产学习的是一个班，带动的是一片”，厂里很欢迎。

现在，学习班结束了，但斗争还在继续。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长期的，有阶级斗争就会有尊孔派。这种斗争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把批孔斗争坚持一天。我回厂后，就和车间里大批判积极分子一起学习，一起批林批孔，还向他们交流了自己几个月来

的学习体会。在工人老师傅们的鼓励下，我还结合自己体会，作了两次关于儒法斗争情况的介绍。我决心继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哲学史，坚持战斗。

陆金兰：

批判儒家和研究法家都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我们作为工人理论队伍中的一名新战士，还要努力作战。最近，我们厂在党总支领导下，为了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组织了一个由工人同志参加的中国哲学史学习小组，正在为研究法家代表人物李贽的反孔言论作注释译文。我正好搞过这方面的文章，就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投入战斗。我决心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刻苦学习理论，力争做一个能文能武的工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 在批林批孔中增长革命才干

新海农场 黄龙珍

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农场工人。最近，参加了批林批孔学习班，和同志们一起，写了一篇《从青铜器看吃人的“礼治”》的文章。在过去，青铜器是资产阶级金石学“权威”霸占的世袭领地。今天，我们青年工人为了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三“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硬是要闯一闯这块历来被资产阶级“权威”们霸占的禁区，试试我们工农兵的革命锋芒。

刚进博物馆，乍一看陈列满室的古董，确实曾经产生过畏难情绪。我过去没有接触过古代文物，什么鼎、钟、彝，形状都稀奇古怪，我过去从未见过，至于那上面刻着的古代篆文，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竟然要用这些材料写出批林批孔文章来，对我来说，可真是个难题呵！如何才能攻克这一难关，我急得好几个夜晚睡不好觉。打退堂鼓？不。批林批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尖事，如果我们攻不下这个难关，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是又要发出冷笑了吗！株彪、孔老三骂我们劳动人民“下愚”，资产阶级“权威”也污蔑我们工农兵“古文弄不懂，只能写豆腐干式的表态文章”。他们越是污蔑我们不行，我们越是要用批林批孔的革命行动来驳斥他们的胡言乱语，偏要闯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领地”，来上一番“夫闹天宫”。

在前进的道路上，拦路虎是很多的。例如，夫克鼎上有这么两句话：“易安井退劓人获，易女井人奔于叢。”开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尤其象“劓”、“獲”等字，翻了好几本字典、辞书，都找不到。困难可实在是大啊！毛主席一再教是我们，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广大工农兵就是要勇于挑起为革命而学习历史的重担。这时在我眼前，浮现出了《杜鹃山》中雷刚坚持为革命学文化的激动人心的情景：“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它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我是一个革命青年，难道就不能学习革命先辈为革命攻克文化关的顽强精神吗？如果我们今天碰到文字上的困难就畏葸退却，怎么对得起革命的先辈呢？我下定决心，要知难而进，学习雷刚同志为革命学文化的精神，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全文，认真钻研。我们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四个青年同志，互相鼓舞，互相帮助，共同努力，终于弄懂了二千多年前的这两句古话。原来，“井”、“退”、“劓”都是家族的名称，“獲”在这里可作“媾”解，指的是媾藉之媾。这样，才逐步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周天子对奴隶主夫贵族克说：“将井、退、劓三

(下转 36 页)

##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方 海

毛主席说：“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我们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当前，我们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去分析国际形势，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本质，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一伙的卖国主义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辩证唯物论认为，现象和本质是事物的两个侧面。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现象只反映事物的外部形态。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入门的向导。但是，现象并不等于本质，认识了事物的现象并不等于认识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但本质常常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对事物的现象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我们认识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就要透过他们暂时表面强大的现象，洞见他们反动的虚弱的本质。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六年，正当美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地挥舞原子弹吓人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它的纸老虎的本质，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当苏修气势汹汹地挥舞指挥棒、不可一世的时候，毛主席也同样地看透了苏修的本质，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毛主席的这些著名论断，为我们精辟地剖析了反动派的现象和本质。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从现象上看起来“烈烈轰轰”，拥有大量的核武器，都有那么大的摊子，又都是富国。但实质上都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困难重重。用《红楼梦》中那个古董商冷子

兴的话来说，叫做“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苏修、美帝到处侵略、掠夺、剥削，顽固地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他们在本质上必然是没有力量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他们政治上极其虚弱，世界人民不喜欢他们，本国人民也不喜欢他们。外表上虽是个老虎，但由于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在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四分五裂，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好过，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早已是强弩之末，无法再振作起来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要的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现象的一种，但又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它表现本质，但它歪曲地甚至颠倒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苏修、美帝叫嚷的什么“和平”呀，“裁军”呀，就是他们制造的假象。但是，假象的东西是不稳固的。列宁说得好：“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苏修、美帝叫嚷的“和平”、“裁军”以及他们之间的勾结都是非本质的东西，是象泡沫那样很快要消失的。在帝国主义“和平”、“裁军”的背后，是侵略、掠夺，是扩军备战，这才是本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帝国主义不就是在什么“和平”、“裁军”的烟幕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今天同样地也并不例外。苏修、美帝的这种妥协和勾结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的争夺遍及全球。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他们以为只要制造假象就可以迷惑人民，但事实却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如同泡沫的不稳定性正好表明了河水具有流动的本质一样，说假话、制造假象也是本质的一个构成“环节”，苏修、美帝的“和平”、“裁军”就正是充分表现了他们虚伪狡猾的本质。

要不被假象所迷惑，就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比较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硫化铜与黄金表面看起来是很相似的，如果我们孤立地从现象的一个方面去看，就会把硫化铜误认为黄金。但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或者进行一次化学试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金属。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对那些挂着“马列主义”招牌或口讲

“和平”的社会帝国主义，同样地要学会看他们的实际行动，看他们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是否一致。事物的本质决不是一下子暴露出来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地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直到认识更深刻的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过程。苏修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就有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庐山真面目是逐步暴露出来的。我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归根到底，认识决不可能一次完成。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再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它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过程，与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研究历史，对事物进行历史的考察，是我们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势力，由于他们都有共同的剥削阶级本质，因此他们的活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研究老牌帝国主义，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苏修、美帝；研究历史上的没落阶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没落阶级。历史上，反人民的反动阶级力量再大也总是要走向灭亡，而新生的革命力量尽管弱小却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你看，随着世界人民的觉醒，第三世界的兴起，英国的星辰落下来了；美国的星辰也落下来了。那个做着建立横跨欧、亚、非、拉的殖民大帝国迷梦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曾几何时，也已经内外交困，一天天烂下去了。与反动势力相反，新生的革命力量却总是在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这支革命力量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最后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今天，那些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第三世界的中小国家，从表面上看穷而弱，但他们是新生的、发展的力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斗争实践证明，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些新生的、发展的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宣告了帝国主义称霸世界时代的结束。别看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气壮如牛，老想侵略人家，实际上他们胆小如鼠，怕第三世界，怕世界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之中。

能不能正确分析国际形势，透过现象认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这历来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路

线头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们无法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们总是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总是只看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的表面强大，拜倒在帝国主义脚下，而看不到它们虚弱的反动本质。林彪就把苏修、美帝看得那样的了不起，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把我国置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之下，使我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

同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能够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锐利武器。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借助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感觉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深入揭露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上接 32 页）

家连同当地在籍的奴隶赏赐给你，并把并家逃亡在梁地的奴隶也赏赐给你。”这下就清楚了，孔老二念念不忘要恢复的“周礼”，无非是把劳动者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制度。青铜器虽然无声无息，但深刻地反映着当时奴隶制的血腥统治，反映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以及奴隶们的英勇反抗。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劳动人民重新去过奴隶般的牛马生活，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阶级感情，终于顺利地写出了这篇批判文章。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些稀奇古怪的青铜器和它们身上刻着的弯弯曲曲的既象画又象字的铭文，也不再觉得神秘莫测了。事实再一次证明，人们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天生的，古代史这个科学领域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高深莫测。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只要我们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就一定能在斗争中增长自己的革命才干。

# 《帝国主义论》历史背景简介

余 来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部著作是列宁同修正主义进行长期斗争中写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通过这部著作系统地批判第二国际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理论,总结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规律,阐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进程,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斗争。

《帝国主义论》是指导我们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基本矛盾,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苏修叛徒集团、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理论基础。在批林批孔中,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部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当代世界形势的分析,结合学习邓小平团长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有重要的意义。回顾列宁在写作这部著作前后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战斗,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帝国主义论》这部光辉的著作。

## (一)

帝国主义制度是产生现代战争和修正主义的根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都激化了。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就敏锐地指出:“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帝国主义是伴随着战争走进人类历史的。十九世纪末叶,各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霸占的殖民地最多。英国拥有九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共三亿零九百万人口。法国拥有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共五千六百四十万人口。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十九世纪末叶,英

国已从世界霸主的地位跌落下来，德国、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已逐步赶上并超过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到处排挤英国的势力了。这样，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已不可避免。一八九八年发生的西美战争，一八九九年发生的英布战争，一九〇四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成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奏曲，标志着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1898—1914年间最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的。西美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随着帝国主义的到来，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一九〇五年由日俄战争引起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到一九〇四年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结束，开辟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继俄国革命之后，中国等一系列亚洲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帝国主义制度是产生现代战争的根源，也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扑灭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垄断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和培养工人贵族。这样，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就逐步泛滥起来。一八九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公开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叫嚷“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拼命赞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平”，竭力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宣扬垄断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修正主义谬论。同一年，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成为“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其他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也不断冒出修正主义的逆流。这时，列宁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立即觉察到这股逆流，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办?》)

这些情况表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国际范围内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了。

这场伟大战斗的序幕，是由列宁揭开的。

在这场伟大战斗的最初年代，承认还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成了斗争的焦点。

### (二)

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继西美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军备竞赛，加紧准备一场世界大战。一九〇七年，欧洲最后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为一方，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英、德两霸之间的矛盾成了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的阴谋正在积极策划着。

当时，英国野心勃勃地要建立“更大的不列颠”王国。德国则竭力向中东扩张，企图夺取英、法的殖民地，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法国要从德国手里夺回亚尔萨斯和洛林，占领鲁尔煤矿区，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俄国的胃口也很大，它狂妄地要鲸吞巴尔干，控制地中海，征服伊朗，称霸远东。美国和日本也虎视眈眈，准备趁火打劫。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一切所作所为，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相互之间的争斗更加尖锐激烈了。“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主张到处发展军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帝国主义大战的乌云笼罩着欧洲。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采取什么立场？在当时成了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第三国际修正主义者当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就一直在替帝国主义高唱赞歌。他们鼓吹帝国主义是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散布“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的幻想。当世界大战的乌云越来越密集的时候，第二国际最大的“理论家”考茨基仍在叨念“托拉斯的倾向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之类的“和平经”。一九一二年，正当德国支持土耳其插手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竟说：“在我们这里，人们的确不希望战争”。这种“持久和平”的幻想，早在一九〇七年举行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就暴露了。列宁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同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使大会通过了经过列宁修改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决议。但是，列宁指出，这次大会“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表现动摇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九一〇年，第二国际举行的哥本哈根大会，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就更加严重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第二国际在一九一三年举行了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由于广大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的强烈要求，迫使这次大会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并且促使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战争将造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让各国政府不要忘记，在欧洲当前的局势和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下，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让它们记住，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引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列宁认为这个宣言“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第二国际的破产》）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从来不准许实行这个宣言。他们“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考茨基甚至对工人阶级发出威胁，如果工人起来组

织反对战争的武装起义和总罢工，那将是错误的。第二国际的这种修正主义立场，在《巴塞尔宣言》通过不到两年就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地暴露了。

一九一四年七月，紧接着一九一三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一九一三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巴尔干半岛爆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战争首先是由以德国为首和以英国为首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掀起的，日本、美国先后也加入了战争。到一九一八年，共有三十个国家参加了这场帝国主义大厮杀。

这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目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叛徒嘴脸。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些修正主义者一直散布种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抹煞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考茨基就鼓吹：“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世界大战一开始，他们又声嘶力竭地叫嚷：要“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狂热地支持这场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考茨基叫嚣：“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在关于帝国主义谬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保卫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表明他们已彻底叛变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

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以后，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宏伟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列宁为首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了。

战争开始以后，列宁到了瑞士的伯尔尼，马上向各国无产阶级发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伟大号召，为世界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团结到列宁的周围，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时，“建立一个排除并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主义与战争》）已提到日程上来了。

### （三）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只有在清除机会主义流毒的斗争中才能成长壮大起来。

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死亡以后，列宁为了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团结各国党内的左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列宁指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尽管他们起初为数很少），用他们的名义向人们提示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面来。”（《社会主义与战争》）

为了团结左派，列宁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和八月，先后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两篇著名论文，更加完整地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了在帝国主义大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列宁还准备并且亲自出席了同年九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国际社会

党人代表会议，领导左派同参加会议的考茨基派进行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尽管处于少数地位，但经过斗争，在通过的宣言中还是体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宣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第二国际“保卫祖国”的反动口号，在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以列宁为首的左派针对宣言的不彻底性，在会上发表了声明，表明了左派的原则立场。列宁在评价这次会议的时候说：“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大的成就。”（《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会议以后，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组织。

战争进入一九一六年，两大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厮杀得精疲力尽，谁也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它们国内的革命危机却日益成熟，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制度的存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防止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一时间，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和平的声浪翻滚了起来。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考茨基之流的所谓“和平纲领”也抛出来了。为了粉碎考茨基之流关于社会和平主义的叫嚣，使工人运动继续沿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轨道前进，列宁写了《论“和平纲领”》等著作武装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一六年四月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主要讨论了无产阶级在结束战争、争取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对考茨基之流鼓吹的和平滥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严正指出：“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要实现民主和平是不可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提案由于右派的阻挠没有通过。经过列宁的坚决斗争，会议通过了谴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持久和平”，“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内”。通过这次会议，左派的力量有了发展。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列宁建立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在斗争中不断地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滚入了社会和平主义的泥潭，齐美尔瓦尔得集团分裂了。但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却在清除机会主义污毒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正是当时的这批人数不多的、在列宁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未来的第三国际的核心，率领着各国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展开新的搏斗。

#### （四）

同修正主义者不但要从组织上实行彻底的决裂，而且要从理论上加以彻底的清算。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发展，空前地唤醒了各国人民，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同第二国际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但是，组织上的决裂，不等于理论上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的残渣余孽考茨基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窒息战争必然引

起革命的烈火，抛出了一部名为《帝国主义》的大毒草，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考茨基反对把帝国主义的出现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鼓吹帝国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将来也可能为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所代替，从而出现一个“实现持久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在各国人民革命烈火行将燃烧、在考茨基之流又一次充当帝国主义消防队的形势下，从理论上对帝国主义及其产物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粉碎考茨基修正主义的谬论，教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理论上同考茨基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制订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已经成为极其迫切的任务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组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紧张战斗的同时，以惊人的精力开始研究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各国各方面的文献，写下了四十多印张的《关于帝国主义笔记》。在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列宁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九一五年八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篇著名论文中第一次表述了这个发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它极大地鼓舞着国际无产阶级为突破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一九一六年一月到六月，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论活动。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帝国主义论》这部辉煌著作诞生了。这部著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帝国主义论》“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一九一七年六月，《帝国主义论》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出版，沉重地打击了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从理论上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列宁指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的僵死理论，“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正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山雨欲来风满楼”。《帝国主义论》的诞生，向全世界宣告：“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它预示着，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 （五）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目的是为了对内更加穷凶极恶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更加疯狂野蛮地侵占和掠夺更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镇压方兴未艾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一九一七年，在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俄国无产阶级率先掀起了二月革命的风暴，把沙皇这只纸老虎卷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向无产阶级发出战斗的号召，“支持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起来革命吧，推翻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反对战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率领俄国无产阶级趁热打铁，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暴力一举推翻了在二月革命中篡夺了国家权力的克伦斯基反动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援下，俄国无产阶级冲破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把落后的、军事封建的俄国帝国主义打倒了。各交战国的革命运动普遍高涨。帝国主义阵营一片混乱，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历时四年多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了。

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帝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帝国主义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激起了强大的革命风暴。亚非拉和其他地区广大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纷纷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十月革命以后最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日益激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国人民一贯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思想武器，它将继续指引着亿万人民为彻底埋葬帝、修、反，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新世界而顽强战斗！



# 修正主义路线头子 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摘编

## 一、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宣称只要帝国主义头子 实行另一种政策，就可以使帝国主义改变本性

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力量问题，而不是经济必然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不是必要的，它对经济生活的意义还被漫无边际地大事夸张了。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政策，正象它取而代之的曼彻斯特主义一样。后者也不表示一定的“经济阶段”，尽管它必然和这种阶段联系在一起。

考茨基：《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

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我认为通过财政资本的另一种政策它就可能改变。

考茨基：《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

同志们，要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由人来决定的。而这些人也有脑壳，也有脑髓。他们的脑髓球往哪个方向转，这是另一个问题。……就连帝国主义者——如果不算那些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疯子——也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实际情况，不得不考虑到已发生变化的世界力量对比……

赫鲁晓夫：《1969年7月19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西方的有势力的人士中间开始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坦自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赫鲁晓夫：《1956年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

我们区别地看待资本主义阵营中比较温和的一派。他们代表虽然仍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思想上的敌人，但他们对目前世界上的力量对比有着足够清醒的估计，并且愿意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国际事端的办法。我国在奉行对外政策时考虑到了这种倾向。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黑会上发言》（1969年6月7日）

修正主义中有明智派，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的少数人是可以改正错误的。

刘少奇：《与外国青年的谈话》

## 二、宣扬“侵略有理”，竭力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涂脂抹粉

对帝国主义说来，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并吞的那些国家，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它们因而在政治上也是落后的。它们还都处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阶段，还没有能力建立现代的、民族的、大国的民主制度，这不是由于任何种族特性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这种民主的物质前提条件。……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文明民族对非文明民族的一定的监护是必要的，这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的。……文化发达的民族完全有理由在不同情况下使不发达的民族屈从自己。

伯恩斯坦：《1907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承认野蛮人对于被他们占有的土地的权利也只能是有条件的。归根到底，较高的文明在这里也有更大的权利。赋予利用土地的历史的权利名分的，不是土地的征服，而是土地的经营。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任何部落、任何民族和任何种族都不能说对任何一块居住着的土地有一种绝对的权利。地球不归属于任何尘世之人，它是全体人类的财富和财产。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和殖民问题》

殖民主义的根子已经拔除，但是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殖民主义的细根。

赫鲁晓夫：《1960年3月5日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西欧、北美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他们不革，你有什么办法？而且他们拥护帝国主义，他们赞成殖民地……剥削殖民地，工人可以得到一点好处……。

刘少奇：《某次和外宾的谈话》

## 三、宣扬“超帝国主义论”，鼓吹帝国主义可以联合起来，可以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

没有什么比下列断言更错误的了，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有持久和平。据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居统治地位，仿佛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发生战争。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但决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了它之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

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

考茨基：《帝国主义》

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不会再有任何东西能阻碍这一点，紧张局势的这种大大缓和，最终将通过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消灭帝国主义。

考茨基：《帝国主义》

……一旦战争和胜利的兴奋消散下去，并且在世界上普遍被清醒的思考取代以后，和平条约的倡议者就要对条约作一次这样的审查。为了在不致发生国际的灾难和暴行的情况下使和平条约更完善，创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把地球变成自由、平等、彼此友爱地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一个大家庭的居处，就是说，为了达到许多理想家为世界大战提出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至高无上的手段就是国际联盟。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我们伟大的党在通过自己的新纲领时，向人类庄严地宣布，它认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不仅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就把战争永远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18日在苏共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

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在资本主义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把世界大战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掉的实际可能性。

赫鲁晓夫：《1959年1月27日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世界两个最强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

赫鲁晓夫：《1956年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

如果我国的政策得到它们的相应反映，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缓和将是稳定的，和平共处是各国关系的普遍准则。这就是说，我们星球上的和平将是真正持久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有可能消除。

勃列日涅夫：《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1972年12月21日）

你们知道，国际舞台上在很多方面正在形成新的局势。我们有理由说，紧张局势的缓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正在继续发展，两大世界体系直接对抗的威胁正在减弱。今后，我们将继续争取完全消除世界大战的威胁和使和平共处政策在世界上获得胜利。……所有这些使得有可能指望，现今的缓和，这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开端。

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的讲话》（1973年8月15日）

#### 四、鼓吹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经受住了那么多的危机，懂得了适应那么多新的、往往十分令人惊骇的、极其巨大的要求，结果今天在我看来，纯粹从经济上来观察，它远比半个世纪以前更有生命力了。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迅速而无情地打破旧建筑，而是仔细地研究它的结构，以便最合宜地利用它来作为新建筑的基础。……如果我们的任务只是最迅速和无情地摧毁资本，那会是完全多余的呀。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工业卡特化同样使以前做不到的生产调整成为可能，这种卡特化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所起的作用，看起来将使营业活动中的危机和萧条比以前更快地得到克服。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我宣称关于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的概念是“彻底虚妄的”。别的不说，它完全忽视了不同的工业在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忽视了它们对于公共服务形态的十分不同的适合程度。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我们一向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得很好的、人民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

赫鲁晓夫：《1959年9月19日在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制片厂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你们的国家是富有的，你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平。……我是来看看资本主义的奴隶们是怎样生活的。我应该说，你们生活得不坏。

赫鲁晓夫：《1959年9月24日在匹兹堡市同美国实业界和社会人士会晤时的讲话》

如果今天它是“纸”老虎，那么说这种话的人知道，这个“纸”老虎有原子牙齿。

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和平共处和和平的原则完全符合目前所有革命力量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在基辅的讲话》（1965年10月23日）

我们自顾不暇，那能去惹美帝、苏修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呢？

刘少奇：《1962年1月讲话》

## 五、宣扬时代已经改变，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理论已经过时

现在也不能机械地重复列宁在好几十年以前所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话，即肯定说，在社会主义尚未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的条件下，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21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目前对于历史过程的发展、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许多现象在当时还不存在。

赫鲁晓夫：《1960年6月21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这个新时代……它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也和世界上还没有和刚有一个国家实现了马克思理想的列宁时代不同。

林彪：《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八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

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

在近代历史上，沙皇俄国是靠火和剑的征服、兼并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殖民帝国。十五世纪末，当俄罗斯刚形成统一国家不久，第一代沙皇伊凡第四便以古罗马帝统的继承者自居，宣称要建立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以后，好几代沙皇都梦想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甚至还妄图把印度和夏威夷也收入帝国版图。一百年前，马克思在揭露沙俄的侵略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在它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向巴尔干、中近东扩张，进而争霸欧洲，是它的传统的侵略路线。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对于观察当前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动向，不无裨益。

沙俄争霸世界的扩张活动主要按照西进、南下和东征三个方向进行。

向西扩张，称雄欧洲，这是沙俄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点。近代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心脏地区。谁主宰了欧洲，把欧洲列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谁也就可以把这些列强的海外属地和势力范围搜为己有。因此，第一个称大帝并为后世沙皇规定种种侵略方针的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在位），就把打开通往西欧的“窗户”看作首要战略目标，并拚其全力创建海军，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为沙俄争霸欧洲迈出了第一步。那个被俄国贵族颂为“贵族女王”的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在位），更是念念不忘征服欧洲，她曾狂妄叫嚷：“假如我活到两百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罗斯统治之下”。直到二十世纪初，沙俄仍然把扩张重点放在欧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七在位）一再强调，俄国的政策是“不要漠视东方，但是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方”。

东征侵略中国、朝鲜，夺取东亚霸权，是沙俄全球战略的另一组成部分。俄国沙皇曾毫不隐讳地说，“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罗斯的势力，从长远来看，正是我们统治世界的重要课题”。

向巴尔干、中近东扩张，在沙俄争霸世界的战略中，起着包抄西欧的作用，是“声东击

西”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时，它把注意力放在宰割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上。

在近代，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巴尔干、中近东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它扼欧亚非三洲的咽喉，控制着黑海和东地中海的门户以及通往印度洋的航路，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地区又是一个广阔的市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沙俄对这个地区一直十分着迷。恩格斯在揭露沙俄对土耳其的扩张野心时指出：“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页）“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页）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历代沙皇发出了疯狂的叫嚣，要侵占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沙皇格勒，把基督教的十字架竖立在索菲亚清真寺的塔尖上。彼得一世首先把这种侵略野心变成了侵略行动，为此建立了沙俄第一支舰队，在十七世纪末连续两次发动对土战争，远征亚速海，夺取亚速要塞，揭开了南下侵略扩张的序幕。从此以后，一次征服接着一次征服，一次兼并继之一次兼并，每隔一三二十年就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土战争。明抢暗夺，不断肢解，至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领土那么大。

沙俄侵占中近东的关键目标，是独霸黑海海峡。只有控制了海峡，它的庞大黑海舰队才能西出地中海，进逼欧洲的心脏地带。在叶卡特林娜三世时期，沙俄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亚速海沿岸地区，兼并了克里木，把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了德涅斯特河，第一次实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打开南方“窗户”的愿望，取得了通航黑海海峡的权利。

沙俄夺取海峡，意在西欧。当它一获得海峡的通航权，马上利用欧洲激烈动荡的时机，在一七九八年把庞大的黑海舰队开进法国的“内湖”——地中海，次年占领科孚岛，觊觎马耳他。与此同时，它又派大量陆军远征被法国占领的意大利，用刺刀在那不勒斯王国“恢复王位和祭坛”，从陆地到海洋展开了同拿破仑帝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自此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几次进军西欧和中欧，镇压革命。在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中爬上了欧洲大陆霸主的地位。

## 三

沙俄向巴尔干、中近东扩张，不能不同西方列强发生激烈的争夺。在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沙俄先是同英国，后是同德国在这里演出一幕幕既争夺又勾结的丑剧，造成了这个地区长期不得安宁的局面。

十九世纪中叶，俄英两霸的既争夺又勾结，在“东方问题”上激烈地表现了出来。所谓“东方问题”，其实质就是夺取急剧衰败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问题。英国打着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旗号，企图独占中近东，和英属印度联成一片，保障大英殖民帝国的生命线，并作为阻挡俄国南下的屏障，把俄国熊关在黑海的彼岸。俄国则要肢解土耳其，夺取

巴尔干和黑海海峡，南下掐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一个从西向东，一个自北而南，在这里迎面相撞。俄英两霸冲突的焦点，首先还是海峡问题。

一八三一年，当土耳其属地埃及的总督起而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候，沙俄一反常态，打起了保护土耳其“完整”的旗号，向土耳其苏丹政府主动建议，协助镇压埃及的反抗，派遣军舰开入波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苏丹眼见危在旦夕，只得借用沙俄的刺刃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说：“当人溺在水里的时候，纵使毒蛇也要抓着来救命。”可是，沙俄这条毒蛇，当然不是来“救命”的，而是来咬人的。它凭借驻扎土京附近的三万大军，乘机敲诈勒索，逼使土耳其签订秘密条约，规定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利益，禁止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黑海海峡。俄国人说声“开”，海峡就向俄国人开放，俄国人说声“关”，海峡就对其他国家的军舰关门，土耳其苏丹只不过是一个为俄国人看门的更夫，而黑海则变成了沙俄的内湖。俄国独霸海峡，引起了英国的恐慌，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八四一年由英国打头，联合普、奥等国对沙俄施加压力，迫使它在伦敦签订海峡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战舰平时都不得通过黑海海峡，使得沙俄独霸海峡的野心宣告破产。

沙俄独吞海峡的野心一再碰壁后，便改变策略，企图与英国两家合伙瓜分土耳其。一八四四年，尼古拉一世亲访伦敦，同英国进行秘密瓜分土耳其的肮脏交易。一八五三年，他又同英国驻俄大使秘密会谈，提议两国缔结瓜分土耳其的“友好”协定。沙皇尼古拉一世大肆鼓吹大国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他对英国人说：“只要我们达成协议，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但是，沙俄要同英国拴在一起是不那么容易的，俄英两家在这一地区的争霸斗争是无法调和的。英国根本不愿同俄国分享霸权，而沙俄的建议也不过是它玩弄的一种策略，最终目的还是要独吞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说：“如果英国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己的统治，我是不允许的”，而要俄国“作为暂时的保护者，我是不拒绝的”。对于沙俄包藏这样的祸心的“友好”建议，英国是不能接受的。

图穷匕首见。软的不行来硬的，文的不行来武的。一八五三年十月，沙俄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战争在多瑙河、高加索和黑海海面上全面展开，站在土耳其背后的英法立即把舰队开进波斯普鲁斯海峡。十一月，俄国海军在黑海南岸的锡诺普歼灭了土耳其舰队，直逼君士坦丁堡。英法也把舰队开进黑海，并于一八五四年三月对俄宣战。这样，俄英两霸就由谈判桌上的勾心斗角，变为战场上的武装火并，俄土战争演变成了欧洲战争。九月，英法联军在克里木登陆，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战。在战争中俄军连遭惨败，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那个妄自尊大的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玩火者必自焚。他生前曾在妄地叫嚷要用战争为即将死去的土耳其办理丧事，到头来他点起的战火却首先焚毁了他自己。一八五五年九月，英法联军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六年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俄国被迫放弃在黑海保有舰队的权利，拆除黑海沿岸的要塞。这样，英国又用炮舰把妄图冲进地中海的沙俄打了回去。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沙俄从欧洲霸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俄英争

霸斗争的结束。沙俄并不甘心失败，加紧扩军备战，并利用西欧大国之间的矛盾，“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9页）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一爆发，沙俄就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声明废除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中有关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的规定，重建与英国较量的黑海舰队，并于一八七七年再次发动对土战争。强渡多瑙河的俄军，打到了土耳其首都的门口，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这时，英国又一次出面干涉，把舰队开进马尔马拉海，停泊于土京附近，形成了列强争夺土耳其的新的“东方问题”危机。英国的武装示威和列强的联合外交压力，迫使俄国把已经签订的俄土和约提交柏林国际会议重审。俄国被迫吐出了一些已经到口的赃物，但还是大大加强了它在巴尔干的势力，保加利亚变成了沙俄控制黑海和向西欧扩张的桥头堡。

沙俄向巴尔干、中近东扩张，不仅同英国在西翼争夺巴尔干和黑海海峡展开拼死的决斗，而且还在南下的东翼——中亚、伊朗、阿富汗同英国进行激烈的争夺。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北上侵略和蚕食阿富汗、伊朗和中亚，直逼沙俄的心脏；俄国则从欧洲南下，兼并中亚，侵略伊朗和阿富汗，进而威胁印度。沙俄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从伊朗夺取了格鲁吉亚、北阿捷尔拜疆等大片土地。它还在中亚吞并了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一步占领了土库曼地区，与英国指挥的阿富汗军队发生武装冲突，英俄战争夫有一触即发之势。沙俄征服中亚和把伊朗变为自己的附庸国，从而打开了进攻印度的通道，企图用入侵印度的威胁迫使英国放弃在黑海海峡的争夺。恩格斯揭露了沙俄在南下中的声东击西策略，指出：“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页）

俄英之间争夺巴尔干和中近东地区的斗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在这里的争霸斗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

十九世纪末，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在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象土耳其、伊朗等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就更成为它们互相角逐的焦点。垄断资本同封建残余相结合的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特别富于侵略性。它在同日本争夺远东的日俄战争失败以后，再次把侵略矛头指向巴尔干和中近东地区。沙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说：“俄国失去了满洲连同旅顺口在内，因而也失去了在东方通往海洋的出路。从此，俄国扩张海陆军主要力量的地点就只能是黑海了，俄国必须从这里通到地中海。”但是，沙俄在这里的扩张，它现在的主要对手已不再是宿敌英国，而是德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

野心勃勃的德国，为了争夺全球的霸权，加紧了向巴尔干、中近东渗透。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土耳其，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自己是三万万穆斯林和他们的教主——土耳其苏丹的朋友。德国还陆续从土耳其苏丹那里获得了从海峡经科尼亚、巴格达到波斯湾修建一条铁路的租让权，这就是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计划。德国对此曾得意地宣称：“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朗和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接着，德国的军官训练并改编了土耳其军队。德国的扩张，不仅使英国，同时也使俄国感

受莫大的威胁。于是俄英两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德国。”一九〇七年，沙俄同英国缔结了瓜分伊朗、阿富汗的秘密协定，伊朗北部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伊朗南部和阿富汗划为英国势力范围。沙俄在西亚同英国暂时调整关系以后，就马上全力以赴在巴尔干同德、奥集团展开激烈的竞争。双方为了各自的帝国主义目的，都竭力利用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德国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出发，同奥匈帝国一起支持土耳其，极力阻挠巴尔干各国的民族独立。沙俄则竭力利用巴尔干斯拉夫人反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来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夺取黑海海峡，并妄图使巴尔干各国的反土同盟成为未来的欧洲大战中对付德奥的工具。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沙俄同德奥都插手其间，把巴尔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纳入大国争霸的轨道。巴尔干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成了欧洲的火药库。一九一四年夏，沙俄同其他帝国主义强盗一起，就是在这里点起了世界大战的火焰。

沙俄与英国和德国争夺巴尔干和中近东的历史证明：沙俄的侵略野心是不可抑制的。当西欧列强联合起来对付它的时候，它可以被迫暂时接受一些国际协定，吐出一些赃物，以换取一个喘息的时机；一旦西欧列强出现裂痕，有空好钻，它就立即再度挑起战争，妄图夺取海峡，闯进地中海。达成协定，挑起战争，再达成协定，再挑起新的战争，如此循环，这就是沙俄的行动公式。沙俄同英德的争霸斗争，是这个地区长期不得安宁的根源，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 三

沙俄的对外扩张，常常打起冠冕堂皇的“救世”的旗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弃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

在高加索和中亚细亚，沙俄打着传播“文明”，和“防止”他国扩张的旗号，无耻地把自己的殖民侵略说成是“承担在东方的文明任务”。但是血的事实粉碎了这些无耻谎言。以沙俄总督为首的俄国殖民当局，在这些地区疯狂推行反动的“俄罗斯化”政策，残酷的剥削，野蛮的屠杀，摧残民族文化，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无穷无尽的折磨，使许多少数民族陷于灭绝的危险。吉尔吉斯人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年间减少了百分之七到十。残暴的压迫激起了高加索和中亚各少数民族人民猛烈反抗。高加索一些地区的山民起义坚持了四十年之久，才被沙皇血腥地镇压下去。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和阿拉伯地区，沙俄则打起“支持各族人民解放”的招牌，以“援助”为诱饵，进行渗透和扩张。一八七五年和一八七六年，巴尔干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保加利亚人，先后发动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沙俄混水摸鱼，乘机向土耳其发动进攻。它同罗马尼亚达成协议，虚伪保证决不侵犯罗马尼亚领土主权，俄军得以穿越罗境，并在罗军的帮助下，在普勒夫那击败土耳其，迫使土耳其

（下转 59 页）

## 今日之“葛朗台”

求新造船厂工人 章智明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写过一部叫《欧也妮·葛朗台》的小说，老葛朗台是书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主人公。”

此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只是个普通的箍桶匠。时过四十多年，却摇身一变而成为索漠城里累资巨万、金藏满窟的夫富翁。原因何在？巴尔扎克以形象的笔触告诉人们，这是葛朗台善于巧取豪夺、压迫榨取的结果。你看，他拼命吮吸农民们的血汗，甚至要佃户每天为他送去面包和肉，他四出投机钻营，牟取暴利，索漠城里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的抓过一下”。俗话说：鹿毒不食子。但葛朗台却连他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当葛朗台看中了她梳妆匣上镶嵌的金板，便“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了一个睡着的婴儿”，拼命用刀子去撬它下来。巴尔扎克称这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随时都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尖堆的金银”。这确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

感谢巴尔扎克，他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吸血鬼、寄生虫的形象。葛朗台成了那些贪得无厌的投机商、庄园主等吸血鬼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葛朗台的幽灵仍还在四处游荡着。那个唯利是图、损人肥己的苏修叛徒集团，到处骗、偷、抢、刮，在最近连发粮食、石油、军火三笔横财，手狠心毒，敲骨吸髓，足可堪称为今日之“葛朗台”。

凡是吸血鬼、寄生虫，他们都靠压迫和榨取劳动人民为生。葛朗台密窟里黄澄澄的金子，是奴隶们的滴滴鲜血凝结成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处敲诈勒索，乘人之危，贱买贵卖，使发展中国家大批的大米、石油、矿石等等，不断地流进了它的血盆大口。它正如列宁所概括过的那样，“攫取着数百万至数十万万的超额利润，让别国的数百万人民‘驮着走’。”

谓乎不信，请看事实。苏修经常自夸“对发展印度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结果呢，这个农业国的大部分人每月只有三公斤多一点的配给粮，很多人都只能以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此类惨况固然是印度垄断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痼疾，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吸血鬼竭力吮吸印度人民鲜血后带来的恶果。它把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的破烂向印度高价倾销，顺手又从印度捞走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纺织品、手工业品和皮革制品等。这种无耻的残酷剥削，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怒。为此，它在最近突然“慷慨”地向印度提供了二百万吨“作为应急措施”的粮食。难道强盗突然发起善心来了吗？不。黄

鼠狼给小鸡拜年——不安好心。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印度政治上的控制，以便进行更大程度的剥削。有家外国报刊就指出了苏修的这种伪善行为是“趁火打劫”，“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这是一种诱饵，谁若吞下就只有任凭摆布和宰割的了。不要看苏修在口头上“国际主义”之类的高调整天价喊，那犹如蚊子在吮吸人血时必定要哼哼地发上一大通议论那样，目的无非是为了证明其吸血有理罢了。

唯利是图是吸血鬼们的特征。它们对任何人都要进行勒索和榨取，包括自己的朋友、奴才或“盟国”也不放过。在它那里，“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老葛朗台是这样，苏修这个新葛朗台也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吗？实质上就是象葛朗台命令他的总管分管种菜、砍柴、养牲口那样，指挥别国种粮食、造零件、搞高棉，以供它坐享其成，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它不是叫嚷建立什么“平等、互利、合作”的贸易关系吗？结果是强迫别人拿出比国际市场贵一倍的价格买它的石油，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价格卖给它机器。东欧的一部机车，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取三千四百吨石油，但拿到苏联卖，只能换取一千三百吨石油。你讲这种交换关系“不平等”，好吧，就请你尝试一下坦克、飞机的滋味。它干的是强盗买卖。只要你陷进了它布下的蛛网，那是不把你的鲜血吮吸干净就决不会罢休的。

前几个月，苏修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基英夫到美国去演出了一出强盗抢骨头的闹剧。他提出把一九七三年以一蒲式耳一点六五美元价格向美国购买但至今尚未提货的这部分小麦，以一蒲式耳五美元的新价卖回给美国。这笔买卖一做成，苏修就可以不费力气地获取一亿美元的暴利。苏修在这桩“黑吃黑”的买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它的贪婪本质。其脸皮之厚，手段之辣，老葛朗台当也自愧不如。谁若碰上了它，就得当心身上被粘去一层皮。难怪西方报刊在惊叹之余，称苏修这种做法“比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老大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对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同样是一幅真实的写照。它为了不择手段地攫取暴利，在所谓“军事援助”的名义下大量出售军火。到七十年代初期，苏修军火供应已扩及三十多个国家，销售量占世界军火出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尖的军火商之一。只要卢布到手，那管一个个钱币上面沾满了孤儿寡妇们的眼泪。在去年十月的中东战争中，苏修就乘机利用提供军火供应，向阿拉伯国家进行了一笔敲诈勒索的买卖。埃及《消息报》写道：“我们是用牺牲人民的福利和发展计划省下来的数以十亿的钱来购买武器的”。尼泊尔《祖国》周刊说：“苏联实际上在这场（中东）战争中起了一个军火商的作用”。看，世界人民对这个贪婪的吸血鬼是多么憎恨啊！

打倒今日之葛朗台！



## 党是领导一切的

——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杜鹃山》观后

杜 华 章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这是已为我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所要热情讴歌的伟大主题。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杜鹃山》所以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正是因为它调动了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通过井冈山斗争时期一支农民武装的成长壮大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工作者柯湘这一英雄形象，从一个侧面突现了党指挥枪、党必须领导一切这一重大主题。它是当前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有力武器。

“奴隶代代求解放，战鼓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程渺茫无方向，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空怀壮志欲恨亡！”这几句唱词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的概括。雷刚领导的杜鹃山农民自卫军开初“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重蹈着历史上农民斗争的覆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只有在以柯湘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使得这支农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工农革命军一支钢铁队伍，使杜鹃山红旗漫卷，山花开遍。

《杜鹃山》就是围绕着要不要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来选择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展开动人心弦的戏剧冲突的。

找不到党，抢一个共产党员领路向前，这表现了农民自卫军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他们的头脑里自发地产生。雷刚抢来了柯湘，可他对党的性质、对党的路线和政策并不真正理解，因而也就不能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要使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真正接受党

的领导，那就必须用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去改造这支队伍。所以柯湘一到自卫军，首先抓的不是军事，而是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而要进行这种教育和改造，一场严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扁担事件”是第一场有声有色的冲突。

农民自卫军抓来了雇工田大江，把他当成“土豪”，理由是他“为土豪做事”。正在盛怒之际的雷刚“照老章程”，要请他吃“革命的扁担”。对于这种敌我不分、亲痛仇快的错误行为，初来乍到的柯湘要不要出以公心，坚决制止？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柯湘是坚如磐石，寸步不让。她又善于针对雷刚和农民自卫军苦大仇深的特点，因势利导，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当雷刚拔刀相向，逼问柯湘“你这个共产党，是真还是假”的时候，柯湘却从容镇静，请为土豪干过活的人都举起手来。在场的人，除了出身豪门的温其久，哪一个没有遭受过土豪的奴役和剥削？哪一个心里没有一本血泪账？这给雷刚上了第一堂阶级教育课，最后他也不由得把手举了起来。然后柯湘把大家都能接受的简单的生活真理上升到党的路线的高度，用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大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友，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不分敌我友，那就必然背离革命的大方向，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雷刚这一扁担如果打下去，那就是打在自己的阶级兄弟身上，把革命的主力从身边赶走，这是机会主义的孤家寡人的政策。柯湘如果容忍这一扁担打下去，也就是抛弃了党的革命路线，放弃了党的领导。“革命的扁担”究竟打向谁？这个问题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分清敌我友，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贯彻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不会在斗争中迷失方向。

一根扁担教育了雷刚，使他初步懂得了“共产党的王法”；而且深深地感动了田大江，把他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成为忠诚坚强的战士；同时，也落实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彻底打垮了以温其久为代表的军阀作风、流氓主义的“老章程”，使农民自卫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群情激越的新气象，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政策的威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政策是党的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党的政策从根本上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容易被群众接受，最能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离开了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有时表面上也可以显得烈烈轰轰，但真正“积

极”的只是少数人，终究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最终只会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试想，如果农民自卫军由着温其久干，捉住俘虏就杀，抓到土豪做工的就打，田大江还会来参加农民自卫军么？杜鹃山还有自卫军立足之地么？所以决不能把党的政策与群众的积极性对立起来，只有象柯湘那样，坚定不移地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扁担事件”的教育是深刻的。所以当雷刚爽朗地说“听党代表的”时，他的思想已经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提高了一步。但是，现实斗争告诉我们，要“步步跟定共产党”，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牢固地树立起党指挥枪的观念，还要经历反复的曲折的斗争和痛苦的磨炼。《杜鹃山》遵循斗争生活的逻辑，提炼出丰富多彩的情节，围绕着怎样救杜妈妈，展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和狭隘复仇思想的冲突，把戏剧推向高潮，进一步深化了党指挥枪的主题。

狭隘的复仇思想遮住了雷刚的双眼，他“只看到一村一户血泪账，望不见革命的征途万里长”。他不理解党的“敌进我退”“辗转游击”的战略方针，只想冲下山去，拚他个你死我活。这种简单的拼命主义，敌人不但不害怕，还正合他们的心意。毒蛇胆正是抓住了雷刚思想简单、性情莽撞的特点，设下了“金钩钓鱼计”，用杜妈妈作钓饵，引诱雷刚下山。温其久也是利用雷刚的弱点，在自卫军内部推波助澜，并且在雷刚私自下山以后，掀起阵阵恶浪逼向柯湘。这时柯湘面临的矛盾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当形势由于雷刚下山而发生急剧变化，战士们温其久的挑动下象潮水一般涌向山口的时侯，她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党的指示要坚决执行，被捕的雷刚和杜妈妈要立即营救，这时我们都能深切地感觉到柯湘面前的困难有多大，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革命顺利发展的时侯，在胜利的形势下，坚持党的路线也许还不算太难，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风口浪尖上，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路线，就更显出英雄人物的英雄本色。我们看到，正是在革命斗争的一个十分危险的关头，柯湘以太无畏的反潮流的英雄气概，砥柱中流，力挽狂澜，顶住了温其久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使革命转危为安。是什么力量使得柯湘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她“自有明灯在心头”。她靠的就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她就是依靠这条路线，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揭露了暗藏的内奸，团结了广大战士，教育了走入歧途的同志，把杜鹃山的武装斗争引向新的胜利。

杜妈妈曾经称颂柯湘：“她，党的嘱托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柯湘同雷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雷刚是“一时任性，不顾大局”。而柯湘头脑里思考的是革命的大局，胸臆间翻腾的是阶级的深情。她阻止雷刚下山是为了顾全大局；她赴汤蹈火，深入敌巢，营救雷刚，也是为了革

命的夫局。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是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是不是识大体、顾大局，这同样是一个路线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象温其久这种人，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借革命以营私，当然要与我党的路线和政策作拼死的斗争。雷刚与温其久不一样。他怀着对地主豪绅的深仇大恨，扯旗造反。在长夜待晓的时候，他从自己的“三起三落”的失败中，痛切地感到“群雁无首难成行”，渴望找到共产党这指路的明灯。这表明他对党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但是，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这样的觉悟，也就是自觉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克服头脑中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可能逐步建立起来。雷刚曾经感慨万端地说：“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因为他还不理解“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从狭隘的复仇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一村一户看到千家万户，从一山一水看到千山万水，象柯湘那样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这就必须同一切根源于私有制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而在雷刚的头脑里，不但有农民个体生产所造成的狭隘性，而且还有孔孟之道的流毒，主张“冤冤相报”，讲“义气”，不讲路线和政策。这使他的耳根子变得软了。温其久就是利用他头脑中的旧思想，不断地在他耳边刮阴风，刮得他晕头转向，使他背离党的政策、路线，使革命屡次遭受挫折，直到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他才觉悟过来。一个人的转变，往往不但需要正面的鼓舞与教育，而且需要有来自敌人方面的反面的教育。正是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才使雷刚认识到柯湘所执行的党的路线的伟大与正确，认识到人民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才能够无往而不胜。他也终于在柯湘的教育下，识破温其久这个反面教员的真面目，给了他大快人心的一枪。这一枪由雷刚打出是最适宜不过的。它不但宣判了温其久死刑，也表明了雷刚与旧思想、与错误路线实行决裂的决心。这一枪也正标志着雷刚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他在革命征途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雷刚所走过的道路很有代表性，因此也很有现实教育意义。雷刚这一形象是可爱的，这不仅在于他纯朴、直率，爱憎分明，敢于造旧世界的反；也在于他的从善如流、知错就改。“扁担事件”之后，他在柯湘的教育下，当场向田夫江承认错误：“说不尽心悔和恨”，“原谅我眼不亮心不明，是个糊涂人！”一旦改正错误，他的阶级感情就象山泉一样喷涌出来。他贸然下山，身陷重牢，柱妈妈的一席话如电闪雷鸣，开了他的心窍。他“悔恨交加，心似刀绞”，恨毒蛇胆，也恨自己，“悔不该莽撞下山乱了步调”。这时他考虑的就不是母子两人的安

危，而是衷心地希望柯湘千万不要下山，“自卫军火速转移，早传捷报”。犯了错误，使革命遭受损失，自然是可悔恨的；但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一个人在革命的征途上，难免会摔跤和犯错误，只要能够从错误和挫折中引出教训，就能化为革命的精神财富，使自己更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飞奔！这也是我们从雷刚身上得到的深刻的启示。

对于雷刚这样的屡犯错误的同志，柯湘采取的态度，既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也不是简单化地一脚踢开，而是耐心地、细致地对他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帮助他总结教训。为了革命利益，为了救雷刚出险，必要时，她可以出生入死，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何等火热的阶级感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就是应该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党的路线教育人、改造人的威力，才能把党的思想、路线化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把绝大多数同志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围。

“杜鹃花红似血年年怒放”。今天，井冈山的红旗，已经插遍神州大地；杜鹃山的红花，开放得更加灿烂壮丽。我们的党经历了十次严重的路线斗争，经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学习《杜鹃山》，就要进一步确立党指挥枪的深刻观念，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加自觉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起来，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上接 52 页）

签订了和约。可是，战争的结果，沙俄不仅从土耳其那里夺取了大量土地和赔款，还从罗马尼亚那里抢走了南贝萨拉比亚，并把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保加利亚置于沙俄军事占领的武装“保护”之下。保加利亚的官厅、军队和一切制度都是俄国式的，全部大权都操纵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手里，实际上沦为沙俄的卫星国。恩格斯在揭露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的谎言时指出：斯拉夫各族人民获得真正自由和解放的主要障碍和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5 页）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二世的二百多年中，沙皇俄国施尽诡计，穷兵黩武，一再挑起战争。在这过程中，它侵占了大片土地，一度几乎独霸黑海海峡。但是，一切扩张侵略，都要走向它的反面。沙俄的每一次扩张，不仅遭到西方列强的猛烈反击，更重要的激起了被奴役各族人民更剧烈的反抗，酿成了更深重的国内革命危机。正是在沙俄与英、法合伙同德、奥争夺巴尔干、中近东而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奋起革命，埋葬了罗曼诺夫王朝。

今天，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重又踏着老沙皇的脚印，妄图声东击西，争霸欧洲，以达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但是，时代不同了，老沙皇的已经明明白白失败了的事业，在新沙皇手里只会失败得更快，更惨，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

徐 缉 熙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它通过四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史，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揭露了腐朽的封建阶级的反动本质、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可以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借鉴。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要真正读懂这部小说，又必须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阶级斗争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并且“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鲁迅积累起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在世界观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因此，他对《红楼梦》这部政治小说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而且随着他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认识的深化和思想上的飞跃而日益加深。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不但见之于《中国小说史略》等辉煌的专著，而且见之于鲁迅的许多杂文。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把对《红楼梦》的见解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鞭辟入里，一针见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这使我们鲜明地感觉到鲁迅读《红楼梦》是为了总结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性，以提高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并用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也就特别富于战斗性。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写的一篇题为《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杂文，就是一个范例。

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杂文，严厉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忠实走狗“新月派”反动文人。文章从《红楼梦》里一段著名的故事讲起：贾府的奴才焦大，仗着酒醉骂了主子和别的奴才，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对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

这种不争气的主子和忠心的奴才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在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是常见的现象。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就常演出类似的丑剧。一九三一年七月，“新月派”的北京新月书店分店一度遭查抄以及《新月》月刊的被没收，就是一例。鲁迅在这里正是带着几分幽默地把焦大和“新月派”加以对照。

“新月派”反动文人以胡适、梁实秋之流为代表，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忠实走狗。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政府，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战线猖狂进攻。这些“丧家的乏走狗”对国民党反动派竭忠尽智，不遗余力。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胡适在《〈人权论集〉小序》中说了个“鸚鵡救火”的故事，舵山起了大火，侨居山中的鸚鵡“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对她们说，你们这点水，又能起什么作用？鸚鵡说，因为住在这座山里，不忍看到它被火烧掉。这只故事不打自招地道出了胡适一伙向主子表白忠心的奴才心理。他们以鸚鵡自命，眼看革命的烈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遍地燃烧，形成了一片燎原之势，真是五内如焚。因此，虽然“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也要尽他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这样的忠心耿耿，主子理应优礼有加，另眼相看。谁知竟也跟着“遭殃”，这可实在是冤哉枉也了。其实呢，说怪也不怪。原来他们也象焦大一样，对主子有了一点“微词”。胡适一伙是连焦大“仗着酒醉”骂人的勇气也没有的。他们冲着主子汪汪几声，正如鲁迅指出的：“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神经十分脆弱，就连这点“微词”也被认为是超越了主子所许可的“界限”，结果“新月派”的君子们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象焦大一样地被塞进了一嘴马粪。

焦大的遭遇和“新月派”的遭遇，一个发生在封建社会，一个发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却颇有共同的特点。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就是一个贾府，它们都是反动的没落阶级，都处在“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世”，都是“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纸老虎，而“新月派”就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焦大的角色。

贾府的主子们不能容忍焦大的骂，国民党反动派连胡适一伙那点子“微词”也受不了，他们都是那样地虚弱，经不起一点儿风吹草动。但是，胡适一伙的被塞上一嘴马粪，却又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叭儿狗也“革命”起来了。这伙政治骗子乘机挥舞起了“言论自由”的旗帜，以掩盖其地主买办阶级忠实走狗的真面目。他们虽然也是“现在的屠杀者”，却比那些挥舞屠刀的刽子手更有

欺骗性。正是针对这一点，鲁迅以洞幽烛隐的眼光和笔锋，看穿了并揭露了胡适一伙与焦犬的“相类的境遇”和共同的本质。他辛辣地指出“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所以只要新月社“辨明心迹”，“马粪”也就立即换成“甜头”了。这就无情地撕下了胡适一伙用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从而教育与鼓舞革命人民与这一伙政治骗子及其反动主子作坚决的斗争。

在鲁迅的杂文中，准确而生动地运用读《红楼梦》得来的体会，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例子很多。他在同“新月派”以及所谓的“第三种人”作斗争的时候，曾经用焦太不会爱林妹妹，“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例子，形象而通俗地说明了人的阶级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九三三年八月，梁实秋林语堂写了一篇题为《让娘儿们干一下吧！》的文章，大放厥辞，说什么当时的世界裁军会议、世界经济会议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世界是由男子统治着的，而男子又是生性爱打仗的，这就使世界陷入了战火连绵不断的“一团糟”的命运。为此，这个“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建议“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鲁迅一看到这篇黑文，就立即针锋相对写了一篇题为《娘儿们也不行》的杂文，文中引用了林黛玉的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语中的地指出：“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内战”，就是阶级斗争。整个现实世界，同大观园里一样，“女界”也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贾府的那些女主子们，“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哪一天不在进行激烈的“战争”？鲁迅深刻地指出了世界之所以有战争，决非是“由于男子爱打仗”，而是因为存在着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什么裁军会议等等，都无非是一种骗局。帝国主义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林语堂一向信奉中庸之道，以孔子之徒自命。鲁迅尖锐地讽刺这类骗子手“东风吹来往西倒，西风吹来往东倒”，而实际上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治天下”的时候，是“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的。

从上述的许多例子可以看出，鲁迅对《红楼梦》的分析之所以如此精当，是因为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一犀利无比的解剖刀，剖视一切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并把这部小说作为一面镜子，照见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鬼域伎俩。正因为鲁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读《红楼梦》的，因此能够得出任何地主资产阶级“红学家”所不能得出的科学的结论。他在这部小说中所见到的，不是什么“吊膀子”，而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就说过：“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



看见许多死亡”。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一谈起贾宝玉，总是津津乐道他的缠绵的爱情，以此抹煞《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而鲁迅则看到，贾宝玉生活于其中的大观园，整个封建社会以及整个旧世界，都是他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人吃人的世界。就在宝玉的眼下，几十条人命，一个又一个被抬上了“人肉筵席”。这里有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更多的是不甘于奴役和压迫的奴婢。什么孔孟之道，全是吃人之道。什么仁义道德，全是吃人的道德。一张“护官符”所反映的地主阶级的政治，还不就是吃人的政治！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愈是临近死亡，也就愈要倒行逆施，它们的内部矛盾和政治、经济的危机也就愈是深重。“许多死亡”，正暴露出这种矛盾和危机的深刻程度；而贾宝玉也正是从“许多死亡”中，感觉到了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命运。正如鲁迅所说的：“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之终于叛逆而去，也正是封建阶级分崩离析、行将灭亡的一个标志。

对于《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地写出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日益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鲁迅是充分肯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鲁迅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价值：“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传统思想”，我们对照《论睁了眼看》这篇杂文就可以知道，鲁迅所指的正是孔孟之道。他在这篇杂文中说道：“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一切腐朽的垂死的反动阶级，都丧失了正视现实、正视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勇气，它们也就靠那“非礼勿视”的孔孟之道来“瞒和骗”。对于孔孟之道这种“瞒和骗”，鲁迅是深恶痛绝的。就是在这篇杂文中，鲁迅不但彻底否定了那些“闭眼胡说一通”的《红楼梦》的续作，而且也批评了高鹗的续书。因为后者也让“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鲁迅幽默地说：“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对高鹗的续书，鲁迅并不完全否定，但上述的那些描写，显然不合曹雪芹的原意，也是孔孟之道的“瞒和骗”的流毒。而曹雪芹的可贵，正在于他敢于冲破这“瞒和骗”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给了贾府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历史结局。鲁迅也正是通过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封建家族的“聚散之迹”中，看到了适用于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普遍的、典型的意义。

鲁迅说过：“《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这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具有规律性。鲁迅尖锐地批判了胡适的所谓“自传

说：“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读《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露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自传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红楼梦》的主题和形象的阶级内容及其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决不是作者自己及其一家人的画像，而是对处于“末世”的封建社会和封建阶级的深刻写照。贾宝玉、林黛玉也好，贾政、王熙凤、贾雨村、薛宝钗也好，都是阶级的典型。书中所描写的四大封建家族及其兴衰演变，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整个封建阶级的腐朽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今天的苏修美帝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某些本质特点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鲁迅也正因为认识到《红楼梦》的典型意义，所以他才能那样准确而又巧妙地运用他对《红楼梦》的分析，切中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对《红楼梦》的评论，从来就是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也总是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去歪曲和利用《红楼梦》，以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的。正如鲁迅指出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否认《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似乎是不讲政治的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罢了。“考证”出《红楼梦》不过是作者的“自叙传”的胡适，不就赤裸裸地宣称他的所谓“考证”，“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免得青年们“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吗？他是在“考证”的幌子下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作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刘少奇、林彪这伙修正主义者也读《红楼梦》，为的是“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眼就看中了《红楼梦》一百零七回，对贾雨村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所使用的那套孔孟的处世哲学心领神会，立即据以总结出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经验，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是多么明确！

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体现着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彻底革命精神。他不但批判了旧红学，而且同所谓的新红学，即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作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的斗争的传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来阅读和评论《红楼梦》，以利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瞿青史洛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此话出自《红楼梦》里的小红之口。她虽是一个连替贾宝玉端茶的资格也没有的丫头，但这句话却一语道破了贾府必然没落的趋势，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地主阶级和一切没落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里的贾府，在曹雪芹笔下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表面上看起来“烈烈轰轰”、“赫赫扬扬”，实际上却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正如那个古董商冷子兴所说的，“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是，“诗礼簪缨”、“功名奕世”的贾府，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会甘心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它越是接近灭亡，越是要虚张声势，以掩盖其脆弱的本质。“千里搭长棚”，就是这样一种垂死挣扎的表现。

“长棚”者，统治机构之谓也。“长棚”搭到了千里之遥，可见贾府统治之广，气焰之盛。在这座“长棚”里面，安排的是给封建统治者享用的人肉筵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翻开《红楼梦》，剖视“大观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贾府“长棚”，就是这样一幅等级森严的图景。在贾府，除了一小撮贵族老爷、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主子而外，还有管家婆，以及教引嬷嬷、贴身丫环、小丫头等。同是女仆，有奶娘、陪房、粗使的不同地位，同是丫环，也有大小、内外之分，即使是管事的、看门的、拉车的奴才，地位、待遇也各各不等。第五十三回写到“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实际上是一次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展览。你看，不但主子“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谁主祭，谁陪祭，谁献爵献帛，谁捧香展垫，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非礼越分，就是奴仆中的男女、小厮、丫环，也必须按差役的上、中、下等的级别，依次向史太君行礼。在香烟缭绕、环佩铿锵之中，高低贵贱之分，男女尊卑之别，是何等地分明呵！贾府的“长棚”，层层夯土，一层压着一层，而压在最低层的则是黑山村的农奴们。在筵席桌上，封建主子们享用着奴隶们的人肉，也享用着本阶级中那些叛逆者的人肉。在这“长棚”里，所谓“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其实是遍地白骨、血迹斑斑的藏垢纳污之地。

“长棚”是瓦鳞栉比，毗连成片的。在《红楼梦》里，贾府和史、王、薛三家“联络有亲”，通过婚姻这条纽带勾结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座“长棚”。在贾府，“老祖宗”贾母，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贾政、贾琏的老婆王夫人、王熙凤都是王家的姑娘，而百万皇商薛家的主母又是王夫人的亲姐妹。后来，薛姨妈的女儿薛宝钗，又被选中为贾宝玉的妻子，成了“亲

上加亲”。恩格斯早就说过：“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正是这种姻亲关系，使贾府成了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封建家族集团。这个封建家族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红楼梦》里的那张“护官符”，就是对这个家族集团互相勾结、无恶不作的深刻揭露。正是在这张“护官符”的庇护下，“呆霸王”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没事人一般”，扬长而去；贾赦可以为了几把古扇子，搞得穷书生石呆子家破人亡；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一下独吞白银三千两，害死人命三条；以“菩萨”自称的王夫人，可以一巴掌置金钊儿于死地，抄检一次大观园，就断送了司棋、晴雯的性命……仅是《红楼梦》里所写的，就有几十条人命案，而那张血迹斑斑的“护官符”，却庇护着那些杀人的刽子手逍遥法外，连汗毛也不曾损着一根。

贾府的“长棚”不仅与史、王、薛三家毗连在一起，而且越搭越广，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都有支撑贾府这座“长棚”的柱子。在这些柱子中，有的粗如合抱，有的细如成指，它们纵横交错地共同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大厦。贾府祖上的宁国公和荣国公，当年与镇国公等并称“八公”，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传至贾政的时候，贾府已成了“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的百年望族，和王公侯伯、内廷太监大抵“非亲皆友”。特别是北静王等亲玉，同贾家休戚相关，有着“同难同荣”的血肉联系。一遇到升迁黜降或婚丧大事，贾府就“吊贺迎送，应酬不暇”。《红楼梦》十三回写到宁国府办理秦可卿的丧事，只见“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山人海，花簇簇官去官来”，真是好不威风。所谓“六亲同运”，就是贾府与其他王公贵族的阶级关系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贾府的“长棚”还搭到了云南、粤东等边远州郡，在各省都有贾雨村、长安节度使云光这样的官吏，作为他们欺压人民的鹰犬，成为支撑这座封建家族大厦的柱子。难怪鸳鸯抗拒贾赦的迫害时，贾赦咬牙切齿地威胁说：“凭她嫁到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从贾赦的夸口中可以看出，贾府的“千里长棚”实际上是一座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太地狱。

但是，贾府的“长棚”真的能千年万载地搭下去吗？当然不能。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贾府的“长棚”尽管可以搭到千里之外，但既有搭就必有散，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就会走向反面。贾府“长棚”的这种搭和散，决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正在走向没落的过程。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了；而作为地主阶级一个细胞的贾府，也已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下坡路上早已走了一大截子了。再往下走，就只能走进历史的坟墓。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贾府的“长棚”搭得再大再广，最后也还是难逃“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命运。对于一切没落阶级来说，“千里搭长棚”的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长棚”每搭出一根柱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长棚”搭得越大，绞索也就套得越多，并且越拉越紧。

如若不信，请看《红楼梦》里的生动写照。

贾府的“长棚”上通皇宫，下结官府，与史、王、薛三家毗连，架子搭得可谓大矣！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请客送礼、应酬往来，而且排场、架子都得摆阔绰、讲场面，不能露出半点寒酸相，以免有损体面。单单到苏州采买戏班子和彩灯、花烛并各色帝帐，就

花去银子五万两。贾府里又不生产一颗粮食，这样穷奢极欲的挥霍费用从哪里来呢？当然只有靠加紧剥削农民。即使是那样一个涝灾连着雹灾的年头，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也还是从他所管辖庄子的农民那里收割了一千多石米、二千五百两银子。几千斤山珍海味，但贾珍却还嫌不足，说：“这够做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贪婪狠毒的贾府贵族，只要农民身上还有一滴血、一根筋供他们榨取，他们是决不会罢手的。但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贾府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必然引起农民的反抗和斗争。《红楼梦》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这种斗争，但从字里行间也已可见一斑。小说七十五回中王夫人哀叹：“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作者在第一回里交代：“偏直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搞得“剿捕”的官兵，“难以安身”。两相照应，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吗？正是这种风起云涌的农民斗争，震撼着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使贾府的“长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贾府的大观园不是天上的伊甸园，“长棚”外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长棚”里面来。贾府的统治者把自己的“长棚”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层层压迫，相互牵制，满心以为可以确保统治，世运久安。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走到了反面，结果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加深了各种危机。奴隶们为了抗议贾府贵族的迫害，有的跳井上吊，有的以死抗婚，有的愤然出家，各种形式的反抗日益频繁。这使贾府的统治者们感到十分头痛，连一向以杀伐决断出名的王熙凤也感到智穷力竭，难以应付，不得不让探春、李纨、宝钗搞了个“三驾马车”式的领导，帮她来收拾残局。结果呢，情况并不见妙。大观园内怠工、失盗、争吵、殴斗等事仍是有增无减。奴隶们的愤怒反抗造成了“长棚”崩塌的危机，“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一处不了又一处”，整个贾府天天处于“地震”之中。

主子和奴隶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主子之间的矛盾也并不见有丝毫缓和。四大家族通婚联姻的结果，一方面固然加强了勾结，另一方面却也加剧了各种派系势力在财产和权力上的争夺。这个表面上“昌明盛隆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内部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个个象“鸟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连一件小小的管理和和尚道士的差使，凤姐要安排贾芹，贾琏要安排贾芸，夫妻之间各不相下。贾政的妾赵姨娘为了替自己的儿子争夺家私和继承权，买通马道婆，装神弄鬼，几乎害了宝玉的性命。以一只“绣春囊”为导火线，爆发了抄检大观园的事件。这实际上是以王夫人和邢夫人为后台老板的两派之争。在抄检过程中，两派的主子喽罗大打出手，把个大观园乱成了一锅粥，使贾府这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益发不可收拾。就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自杀自灭”中，加速了贾府“长棚”的最后崩毁。

贾府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机，使得它到后来只能靠借债典当度日，再也无力满足那些迎往送来、婚丧节礼的应酬需要，“得罪人之处不少”。那些势力更强的统治集团，对贾府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挖脚角、拆台脚。夏太监动不动就向贾府敲竹杠，索取钱财；周太监张口就要一千两，略应慢了一些，他就不自在；贾政放了江西粮道，却被人背后参了一本，降了三级。最后，“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贾府和封建阶级中别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贾府的危机也达到了总爆发的程度。那个锦衣府的赵堂官本来就与贾府有矛盾，趁

着查抄的机会，铁青着脸恨不得把个贾府一扫而光。同朝的官员，一见贾府被人参奏，“俱藏躲不迭”，缩在一旁看好戏。就是那个依着贾府势力爬上去的贾雨村，一见贾家事发，“怕人说他回护一家口”，赶紧落井下石，狠狠的踢了一脚。贾府的女婿孙绍祖，丈人抄了家，“不但不来瞧着帮补，倒赶忙的来要银子”。查抄的结果，贾府活象遭了一场浩劫。两个世职，俱遭褫革。万贯家财，荡地以尽。从此贾府众叛亲离，一蹶不振，那供封建主子们享用的人肉筵席也很难继续摆下去了。奴才们见主子势败，“树倒猢猻散”，个个自寻出路。到王熙凤办理贾母丧事时，已经支使不动余剩下的奴仆，叫了这个，走了那个，脸面丢尽，威风扫地。至于四大家族中的史、王、薛三家，也都在这时先后败落破产，真个是“六亲同运”“一枯俱枯”，泪眼相觑，统统完蛋。呜呼！百年贾府，千里“长棚”，最后只落得个“食尽鸟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贾府的“长棚”垮了，大观园也如鸟兽散。但是，贾府这面镜子却照出了一切没落反动阶级的共同命运。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正沿着当年贾府走过的老路走下去吗？他们为了争霸世界，“千里搭长棚”，到处摆起了供他们这一小撮剥削阶级享用的人肉筵席，不但在欧洲加紧争夺，而且还向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苏修的海军将领公然叫嚣：“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与我国利益有关，我们都要去！”仅在短短几年间，苏修就在世界各地攫取了近九十处海军基地和港口。不仅如此，它还悍然屯兵蒙古，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欺压阿拉伯各国，肢解巴基斯坦，搞颠覆、派间谍，损人利己，无恶不作。另一个超级大国也紧紧跟上，不甘落后，生怕少享了一杯羹。它们就象《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一小撮瘟神恶煞扩张到哪里，哪里就遭灾，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

但是，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就已针对美帝在全球称王称霸的情况指出，“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苏美两霸侵占的地方越多，套在脖子上的绞索也就越多，呆的时间越长，绞索也就拉得越紧。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比当年大观园的“一处不了又一处”还要猛烈得多。地火喷薄而出，“长棚”崩坍不已。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加剧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内矛盾，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危机。它们的胃口大得要吞下整个地球，而实际上力不从心，极端虚弱，连咽粥汤也有困难。一个号称“发达社会主义”，但经济停滞，财政恶化，商品奇缺，粮食不足，人民怨声载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另一个号称“金元帝国”，却通货连续膨胀，财政赤字庞大，内外债台高筑，各种危机频频发生。两个超级大国这种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样子，不正反映了各种腐朽的“内囊”“尽上来了”吗？再往后发展，迟早也必定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红楼梦》里贾府走过的路，也是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必然要走的路。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没落的反动阶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里小红说的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回味的。

# “特种学者”的“考证癖”

戴厚英

胡适自称打破了旧红学，标榜“新红学”。但胡适考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甚至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贾府就是曹家，这正证明了他精通“考证”三昧，实际上根本没有跳出旧红学的圈子。

胡适为什么要鼓吹自传说呢？他自己说是为了“娱乐”，其实原因在于政治。胡适这个“博士”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混血儿。他自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以后又到美国嚼了几年洋面包，养成了一副洋奴的媚骨，接受了一套卖国的哲学。于是崇洋复古，把中国变成彻底的殖民地，便成了胡适的政治理想。一九一七年，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已决心为实现崇洋复古、尊孔卖国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他树起了“文学改良”的小黄旗，混进了五四运动的队伍，这只不过是为他的搞反革命事业涂上一层保护色而已。然而，“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发生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接着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广泛传播。面临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怎不叫胡博士失望、害怕、恼火、焦急？但一切反动派总是越绝望越要挣扎，于是，他抛出了《问题与主义》：“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sup>①</sup>干什么呢？“多研究些问题”。怎么研究？用“我的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从此，胡适染上了“考证癖”。《《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一部考证接着一部考证，真象吸大烟一样上了瘾。目的何在？胡适自己说得明白：“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学，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sup>②</sup>说得清楚，原来他搞小说考证是为了对抗马列主义，实现复辟卖国的反革命政治路线。这倒的确是个“好主意”。一来，可以把青年引到故纸堆中去，免得让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二来呢，通过小说谈

① 《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一集二卷487页。

②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二卷100页。

政治，毒药外面裹上了一层糖衣，欺骗性也会更大些。“特种学者”的与众不同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究竟怎样在《红楼梦》的考证中玩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鬼名堂的呢？看吧。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迫害。但胡适的自传说却力图歪曲和抹煞阶级斗争的存在。这只要看看胡适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的分析就清楚了。这一回写的是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来贾府纳年例。尽管乌进孝向贾珍诉说农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贾珍却还是皱眉头，发脾气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一章清楚地勾勒出了剥削阶级的残忍嘴脸。胡适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红楼梦〉考证》里做了大段引述，还在贾珍的那句话的下面画了圈圈，以示重要。之后，就做了以下的分析：

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象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喜挥霍，爱摆阔架子，……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

看，“自叙传”这个说法，反而把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真事隐去”，使小说变成了对曹雪芹一家由富贵变贫穷过程的琐碎描写，把贾府的衰败归结为挥霍和摆阔。在这里，阶级的对立被抹煞了，阶级斗争的规律被否定了。不仅如此，胡适还通过“自叙传”，给那些害怕阶级斗争会把自己毁灭的阶级一个“防身的本领”，学会理财，懂得节省，缓和阶级矛盾，挽救覆灭的命运。自传说的用处啊，大矣哉！

还有用处呢！那就是否定《红楼梦》的进步倾向。《红楼梦》通过对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腐败。贾府“只有门内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骂得何等辛辣，何等痛快。这触动了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痛处，也触到了胡适之流的痛处。胡适就是反动没落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代表人物嘛。自传说在这里又发生了妙用了。胡适的笔锋一转，于是，《红楼梦》里的揭露和批判就都只是曹雪芹的“深自忏悔”了！好一个“深自忏悔”！它不仅把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揭露说成了自怨自骂，而且向一切敢于揭露旧世界的进步作家泼了一盆污水。胡适的阶级地位和本性决定了他害怕一切革命的批判，“自传说”或“他传说”，其原因盖出于此。

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是没落阶级不甘灭亡、垂死挣扎的一种手段。因此，鲁迅一向十分重视对胡适之流的批判。无论是对《红楼梦》这样的古代作品，还是对现代作品，也无论是对别人的作品，还是对自己的作品，鲁迅都反对胡适派的自传、他传说，而特别强调文



学的典型意义。早在三十年代，正当胡适派新红学风行一时的时候，鲁迅就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吧。<sup>①</sup>

正是这样。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反映。它所表现的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典型，决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的传记。“自叙传”这样的作品自然也是有的。但就是这些自叙传，既然写出来为了发表，那也就必定是为了宣传某一阶级的思想，歌颂某一阶级的人物，而不可以只看做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事了。就说胡适博士的《四十自述》吧，目的便是为了为自己所代表的封建买办阶级争夺文学和历史中的地位，即所谓“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sup>②</sup>所以，我们今天读他的自述的时候，看到的也不只是一个胡适，而是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从胡适身上，我们看到了胡适一类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混血儿所走的道路及其丑恶的卖国嘴脸。

一九五四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然而，时隔不久，在周扬一伙的支持下，就有人跳出来翻案了。一九六二年前后掀起的那股《红楼梦》的考证风，就反映了这种替胡适派翻案的复辟思潮。当时《文汇报》上发表的那篇《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从思潮上看，可以说是一篇反映了胡适派所谓“自传说”观点的代表作。它详尽地考证了大观园的地址，告诉我们大观园就在恭王府，贾琏偷娶尤二姐就在恭王府旁边的花枝胡同。这种反动思潮抹煞了《红楼梦》中反映的阶级内容，把一部深刻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四大家族兴衰史轻描淡写地歪曲成是曹雪芹个人身世遭遇的自述，引导着读者或研究者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走到邪路上去，特别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② 《四十自述》，第61页。

# 从当代苏联“军事题材”作品 看苏联侵略扩张的野心

——苏修文学述评之三

翁义钦 倪蕊琴

一九六八年以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实现争霸世界的野心，把军国主义的宣传活动提到了“特别重大、特别主要的地位”，并且十分重视凭借“文学的帮助”。他们为部署和鼓动创作所谓“军事爱国主义”作品，召开了几十次全国性的会议，什么“全苏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会议”，“全苏爱国主义题材创作会议”，“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创作巡回会议”，等等。会议不仅开得多，而且常有苏修权贵们亲自参加。一些军事头目在会上叫嚷，“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具有现实意义”，是“永久性的题材”，而创作关于“当代苏联武装力量的作品”，更是“军事爱国主义文学的立足点”。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普遍成立了“军事文艺委员会”，颁发种种奖金和奖章。就在这样的鼓动和策划下，一大批所谓“军事爱国主义”的作品竞相出笼。一些写惯了“和平主义”作品的作家，也一反常态，成了歇斯底里的战争狂。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映当代苏联武装力量的作品，如《核潜艇闯警而动》、《礼节性的访问》、《撤岗的人尚未来》、《火箭的雷声》、《捷克斯洛伐克，考验的一年》、《驯服火焰》、《海浪上的花圈》等。还有一部分是以表现国内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为名的作品，如《军官们》、《1944年10月》、《热的血》、《围困》等。

这些所谓“军事爱国主义”的作品，内容十分杂乱，在理论上也没有较为系统的主张。几年来，苏修当局的侵略黑手伸向哪里，这种作品也就跟着写到哪里。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沙皇疯狂的扩军备战和妄图吞并全球的野心。

当前，他们争霸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勃列日涅夫曾明确地说：苏联认为欧洲是“对人类命运很重要的大陆”，欧洲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政策”在苏修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更多、更明显的反映。一九七〇年，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武装部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九七三年，以这场演习为背景的斯捷潘诺夫的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出笼了。这篇小说，对我们了解苏修在欧洲的争霸野心很有用处。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威严的命令支配下，华沙条约各兄弟国家的部队进行了防御战、进攻战、遭遇战，顽强地向胜利挺进。……他们以钢铁的羽翼彼此相接，并肩战斗。……在司令部的军用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的箭头跟蓝色的箭头，针锋相对的碰在一起。

“蓝色的箭头”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种箭头“碰在一起”，正说明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

苏修把东欧各国人民当做与美国争霸欧洲的工具。它利用“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在东欧各国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从各个方面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和奴役。然而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却被美化为“兄弟般的友谊”和“国际主义”。但是，《勃兰登堡门旁》却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小说写到去东德看望儿子的苏联人卡什塔诺夫就这样想：“既然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里生活服役，那末一个别人的国家也就不怎么是别人的了”。卡什塔诺夫的儿子，在东德服役的苏联军人谢尔盖则想得更彻底。在他听着军乐演奏东欧各国国歌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各国国歌连起来演奏，它们听起来就会象是一支统一的国歌——有一种异常光明的基调使它们非常一致，象用一根线把不同的旋律联结了起来。于是他的心里就象过节一样”。把人家都统一在自己的指挥棒下，再也听不到别国的“旋律”，只有“大俄罗斯”的国歌即所谓“统一的国歌”，在天上人间轰鸣，怎么能不象“过节一样”的陶醉？但事实是，当大量苏联军队打着“华沙条约”组织的旗号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捷克人民的心里就绝不象“过节一样”，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他们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把侵略者赶出去。当然，这种反抗的呼声，苏修当局是不愿意听的。一九七三年，当侵占捷克五周年的时候，面对着捷克人民的强烈反抗，苏修抛出了犹利·纳吉宾的电影文学剧本《1944年10月》。剧本别有用心地渲染1944年挪威国境某一滨海小城群众盼望解放的“急切心情”。他们“向天祷告”：“全能的上帝啊，让俄国人快来吧！老天爷，……派俄国人到我们这里来，让俄国人一定得来，再不来就晚了！”不能把这看作是在讲历史。它是在为今天苏修在捷克的强盗行径辩护，而且告诉人们，他们还将将在其他国家干这样的事情。但是，哪怕吹破喉咙，在今天的欧洲，“让俄国人快来吧”的虚设的嚎叫决计掩盖不了“侵略者滚出去”的吼声。

除了重点争夺欧洲外，新沙皇还把侵略魔爪伸向全世界各地，伸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宣扬反华和鼓吹侵华的作品的泛滥，在新沙皇出动武装部队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后，达到了高潮。一九六九年发表的扎多尔诺夫的长篇小说《黄金狂》，被吹捧为坚持不懈地通过文艺描写了俄罗斯边疆新土地的发现者、航海家与考察家的功勋。这“功勋”，其实就是对中国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占领。小说在叙述老沙皇时代与我毗邻的“阿穆尔边区”总督在构思开发“新的疆土”计划时，赤裸裸地写道：“列入新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有相当于阿拉斯加、加拿大……的大片土地，同时再加上一个类似加利福尼亚的乌苏里江地区”。对于老沙皇这种把黑龙江沿岸的一些地区列为“新的疆土”的侵略行径，恩格斯曾指出，“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无论小说作者如何信口雌黄，也抹煞不了这铁一般的历史

事实。

歌颂老沙皇的“功勋”是为了帮助新沙皇建立新的“功勋”。老沙皇拿去的他们要霸占，老沙皇没拿到的，他们也要拿到。米·杰米丹柯的《长城后面》就反映了新沙皇这种要把中国一口吞掉的侵略蓝图。小说写一个来华工作的“专家”在乘火车抵达中国东北地区时，居然说他还没有到达中国：“这还不是中国本身。中国在更远的地方，在几千公里之外，在长城后面，在山海关后面才开始”。这个“专家”在沈阳呆了二年之久，却被说成“一直没有能进入中国”。看来，要不是怕太露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真想一举把中国从世界地图上抹去！

争夺海洋霸权是帝国主义全球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海军副总参谋长就曾夸耀地说过：“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崭新的远洋海军。……它们在复杂的气候和气象条件下，在大西洋、太平洋、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菲律宾海、地中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活动。”这种争夺海洋霸权的扩张行径在苏修文学作品中反映得也很充分。在一九七一年阿·约尔金的“文献性”中篇小说《核潜艇闻警而动》中，苏修俨然以海洋霸主自居，宣称“俄罗斯对海上航行犹如种庄稼一样古老”，甚至超过“最最‘最海上’的民族”，海洋航线是“俄国海军开辟”的。

这是在捏造历史。“俄罗斯对海上航行”并不象“种庄稼一样古老”。直到十七世纪末，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陆国家。正如马克思指出：“沙皇的这样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小说之所以要肆无忌惮地对人所共知的历史进行篡改和伪造，就是要把今天的新沙皇打扮成当然的海上霸王。因此，这部小说又明目张胆地叫嚣：必须摒弃那种“只在自己的领海里逛逛”的思想。“战前我们并不是经常远洋航行，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点明这一“根本变化”的含义，小说还煞费苦心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当人们听到一名退伍水兵“几乎到过全世界”的消息时，认为此人信口雌黄，不以为然。于是，就由一名海军军官出面写了封信，证实退伍水兵的话。据他说，凡是在苏联舰队服役的人，由于“职务的需要”，经常到世界各处去，“在世界海洋的每个角落里航行”，“海洋没有忘记俄国的旗帜”。这就是说，苏修舰队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到处游弋，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侵犯别国主权！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苏修的所谓“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创作”，比其他题材的作品更具有赤裸裸的法西斯气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每一个侵略野心，在这些作品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大概他们自己也感到太缺少欺骗性了，因此，在这些剑拔弩张的作品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专门打着革命旗号为侵略行径辩护的作品。一九七三年斯柯罗霍多夫的短篇小说《父辈们的肖像》就是进行这种欺骗宣传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现役苏军中尉为两个老太婆寻找卫国战争中失去的儿子一事，极力宣传这样的思想：卫国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英雄们的精神被现实的苏军继承下来了，从现代苏军身上看到了当年英雄们的肖像。然而稍微懂得一些历史和当代苏军作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欺骗宣传。谁都知道，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继承了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抗击法西斯而英

勇战斗，“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而今天，苏联军队已经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充当着世界宪兵，与当年的苏联红军早已背道而驰，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呢？

如果一定要从今天的苏军身上看到“父辈们的肖像”，那么，这个“父辈”不是别人，正是老沙皇。这一点，一九七一年上映的影片《军官们》表现得十分清楚。影片开头，一个摸诚过来的沙皇军官、现任的苏军连长和年青军官特洛菲莫夫有一段对话：

连长：你看我，一生都为自己的事业而感到骄傲。我的父亲和祖父也同样为他们的职业感到骄傲。别人是为名利而感到骄傲，而我们是为职业。

特洛菲莫夫：什么职业？

连长：保卫祖国，有这么个职业。

剧本末尾，特洛菲莫夫又重复了“有这么个职业——保卫祖国”这一句话。

妙极了。这位现任的苏军连长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与为老沙皇效劳的祖父和父亲操着同一职业，而年青军官特洛菲莫夫也供认他干的是同样的职业，并且都为这职业而骄傲。

“保卫祖国”的旗号不仅欺骗不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不了苏联人民。广大青年越来越不愿意入伍当兵，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了。“军事爱国主义”中还有一类作品，除了在年青一代中鼓起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外，还公然指责逃避兵役的思想，引诱青年去当兵。一九七一年斯捷潘诺夫的中篇小说《海浪上的花圈》，就通过一个不想当兵，只想考大学的青年在军队中的“转变”告诉人们，逃避兵役的“伙伴们”“想抄近路”，实际上捞不到什么便宜。库罗奇金的中篇小说《士兵的十二次功勋》，则更进一步破口大骂那些把服兵役说成是“沉重的、粗野的和侮辱人的尊严”的人，说的是“灰色母马的梦呓，妈妈的娇儿和糊涂虫的可怜话”。当然，光骂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还有软的一手。一九七三年苏修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的亚力山大·库列肖夫的长篇小说《天蓝色的闪电》中，无耻地描写了通过“美人计”去引诱青年执行“军人的使命”的丑事。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推行侵略扩张的路线，真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出来了！此外，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给那些逃避兵役、害怕打仗的青年吃颗定心丸，也给自己脆弱的神经打打强心针，还通过文学作品鼓吹核武器的“威力”。被誉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影片”《驯服火焰》竟说什么“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可以把火箭发射到世界上的任何一点”。《海浪上的花圈》则宣扬，“如果发生战争，火箭解决一切”，“战士们就象弹钢琴那样按着火箭操纵台。只要揪揪按钮，——就可以让敌人的灵魂安息，叫他们整个城市报销，要是小国家，就叫他们整个国家报销”。乞灵于这种自欺欺人的讹诈，恰恰说明他们时时想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人心背逆、众叛亲离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哪怕你的火箭再多一些，广大的苏联人民不跟你走，世界人民反对你，你还是免不了毁灭的命运。恩格斯早就说过：“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萌芽”，“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当前，反对美苏两霸的世界潮流正在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终究要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的博物馆。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

# 这个公社实现了普及教育

——金山县朱行公社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组

金山县朱行公社地处上海远郊。解放前，这里是穷乡僻壤，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解放后，虽然办起了几所小学，但由于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全公社仍有一千七百多名贫下中农的子女被关在学校大门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公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全公社十八个大队，队队有学校，还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全部学龄儿童和少年都入了学，普及了八年制教育。

## 学校的门为谁开？

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在农村，实行普及教育，实质上就是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由贫下中农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使学校的门真正为贫下中农而开。这一点，在朱行公社是有一个斗争过程的。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号召。朱行公社的贫下中农欢欣鼓舞，接管了全公社的六所小学，发现这些学校集中在几个集镇上，许多贫下中农子女不能就近上学。遵照毛主席“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的指示，许多同志提出要把学校办到各个大队去，否则就谈不上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说，“开出校门就是田，不为贫下中农服务，为谁服务？”有些人还摆出了许多困难和理由，反对把学校办到大队去。

这一场争论，看起来是一个学校要不要搬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学校的门是不是真正向贫下中农开。公社党委抓住这个问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有关普及教育工作的指示。同时和学校教师一起，回顾了本公社在普及教育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个公社，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贫下中农积极办学，小学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但是，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正规化”这把刀，一下子砍掉了六所民办小学和一所中学，使全公社刚上学不

久的七百多名贫下中农子女被迫停学。新街小学原有十三个班，四百多名学生，一下子压缩七个班，不满三百个学生。全公社入学率直线下降到百分之五十。这样一回顾，使大家认识到，在“学校的大门为谁开”的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开出校门就是田”，是不是就意味着学校的大门为贫下中农开了呢？不一定，关键还是要看路线。贫下中农用许多事实，说明了由于路线不对头，学校布点不合理，给贫下中农带来了“五个不利”：第一，不利于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儿童上学一般要跑半小时，最远的要一个多小时；第二，学校搞全日制，用入学考试、留级、退学等重重关卡，使贫下中农子女过了这一关，过不了那一关。原中心小学有两个班，一年级入学时有八十九名学生，到六年级只剩下十八名；第三，搞“正规化”，贫下中农为子女上学每年要花十多元的书学费，进中学更没有条件；第四，学校搞关门读书，智育第一，教出来的学生看不起农民；有的学生小学毕业了不会打算盘，不会种田，不安心农业生产；第五，贫下中农管不着。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学校的大门为谁开，这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有的教师原来认为自己天天在农村，为谁服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通过学习才体会到，要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就必须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有些教师原来怕学校办到大队后生活艰苦，但听了贫下中农诉说旧社会穷人没有文化的苦以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教师。

学校“搬家”那天，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把教师送到了村里，许多老贫农高兴地说：“学校办到家门口，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才办得到。”贫下中农管理了学校，许多困难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没有教室，贫下中农把自己房子腾出来，没有教师，贫下中农推荐复员军人、干部担任，没有桌子板凳，学生自己带凳子，措木条。就这样，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学，许多大队还附设了初中班。开学那天，贫下中农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了学校。过去失学、退学的学生也重新上了学。全公社一下子增加了一百零一个班，二千零九名学生，入学率从百分之六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五。

### 关键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学校办到了大队，校门为谁开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斗争的焦点主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努力做好已入学的少年儿童的巩固提高工作外，还要不要进一步做百分之三点五那一部分未入学的少年儿童的普及教育工作。

有一件事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东风大队有个学生，家里与学校只有一桥之隔，但由于父母要参加劳动，家务事要他做，因此学校虽在家门口，却仍然上不了学。全公社象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女就有几十个。开始，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有的教师认为：“学校都办到家门口了，再来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有的认为：“现在主要是抓提高教育质量，否则就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些情况说明，即使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教师如果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还是不可能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公社党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主席著作，同时组织有领导干部和革命教师参加的调查组，分头到生产队一家一户进行调查，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战斗大队有个教师到水产队去调查，发现这个队的渔民一共只有三个姓，由于不识字，孩子的名字都叫“阿大”、“阿小”，“大妹”、“小妹”。因此，几次调查入学情况，数字都不一样。这个教师还发现，有些年龄较大的孩子，怕学校不收超龄儿童，把出生的月份尽量报小。孩子们这样迫切要求学文化，使这位教师深受感动。她想，有这样多渔民的子女还上不了学，这怎么能算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到了一个革命教师的责任呢？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教室坐满了，普及教育的工作差不多了”。通过调查认识到，从数量上看差不多了，从路线上看，从贫下中农的要求和还有一些贫下中农子女没有入学来看，就差得很多。因此，大家决心在努力做好已入学少年儿童巩固提高工作的同时，努力把百分之二点五未入学的儿童动员入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全公社一百四十九名未入学的儿童主要是由于，生理发育不良，聋儿、哑儿、瘫儿等；家长常年卧病，需要孩子照顾；孩子多，家务重，经济困难。还有些女孩子，因为家长受到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不能上学读书。因此，要做好这部分儿童的普及教育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教师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就能把贫下中农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东风大队有个贫农的孩子，今年十岁，有先天性心脏病，走不动路，说不来话，一见陌生人就要吓得大声哭叫，长期以来，一直关在家里。这个大队的教师在山东李架子大队李守凤的先进事迹鼓舞下，主动送教上门。这时，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叫这个小因读书识字，真是异想天开。”小孩子的家长也说：“老师啊，这个小因连阿爸阿妈都叫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吧！”但这位教师并不气馁，不管刮风下雨，坚持每天送教上门。开始，小孩子读书发音不准，教师弄得满头大汗。但经过三十多天的精心教学，这个孩子第一次用普通话正确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时，孩子的父亲热泪盈眶，紧紧握住教师的手，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新华大队有个聋哑儿童叫周桂英，教师采用了图片、实物和文字相片相结合的方法，教她学文化。经过反复教学，这个聋哑儿也识了字，学了文化。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聋哑儿学文化，真是千年铁树开了花。”象这样的动人事例，朱行公社各大队都有。

思想感情变了，只要是符合贫下中农利益的事情，朱行公社的教师都干。上面提到的那个家庭和学校一桥之隔但不能上学的孩子，家长也想让他读书，但要求迟一点到校，早一点回家，以便料理家务。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允许迟来早退。这个办法一推广，又有许多学生解决了上学问题。他们有的半天上学，有的中午、晚上上学，还有的随到随教。这样做虽然很麻烦，但教师们觉得，只要能贫下中农服务，再麻烦的事情也应当去做。

要使贫下中农子女都入学，还要帮助有些家长克服和摆脱那种“种田凭力气，识不识字一个样”和“男小因读书受用，女小因读书白送”的传统思想。过去，有些教师由于思想上存在“你不来是你自己的事情”的想法，因此，在动员过程中碰了几次钉子，就憋着一肚子气，撒手不管了。现在思想感情变了，就能一次又一次满腔热情地去做动员工作了。许



多教师运用调查访问中了解的实际事例来进行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有一次,水产队鱼苗发生病害,由于会计出差,无人会计算水塘面积,耽误了一天时间,造成大量鱼苗死亡。不少生产队还由于没有识字的人,错用了农药,搞乱了稻种,造成减产。通过这样实际生动的宣传,使贫下中农认识到,干革命,学马列著作,搞科学种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一样都离不开文化,识字不识字大不一样。共和大队有个社员,原来认为自己的儿子腰圆、臂粗,力气大,不读书也可以种田。觉悟提高后,也高高兴兴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洪光大队原来九个没有入学的儿童,有七个是女的,经过宣传教育,也都上了学。

教师热心普及教育工作,大大影响了贫下中农和学生。为了使每一个学龄儿童都能上学,许多贫下中农和红小兵发扬了助人为乐的革命精神。八一学校两个女红卫兵,半年多来,每天轮流背一个两腿残废的女孩上学,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许多红小兵主动帮助那些家务多、父母有病的同学做家务,使他们能安心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公社一百四十九个未入学的学龄儿童,除八个双目失明、精神失常等确实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以外,全部上了学。

### 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办学形式

学生都入了学,但是能不能巩固呢?水产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老师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孩子们都报了名。可是,第二天,却不见一个渔民子弟来读书。为什么呢?教师带着一团疑云跑到水产队,只看到渔民村里除了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和看家的老渔民,该上学的孩子都随船外出了。这种情景,使这位教师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事情,当时公社的中心小学为了让渔民的子弟上学,都把他们在镇上住宿,但是,这种做法影响了渔民的经济收入,结果渔民的子弟干脆都不来上学了。这就引起了教师的深思:水产队的渔民流动性大,孩子要帮大人摇船拉网,捕鱼捉虾,这样全日制的学校怎么能保证渔民的子女天天来上学呢?回来后,这个教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普及农村教育的指示。毛主席说,“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毛主席的话象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个教师的心。她立即向领导提出了针对渔民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办学形式的建议。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办起了渔民夜校班,解决了渔民子弟的上学问题。

这件事对公社领导和其他大队的教师启发很大。他们感到,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普及教育,就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普及教育工作也很难搞好。公社领导和革命教师又一起,进一步批判了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下那种不考虑农村实际情况,只搞“正规化”的办学形式,并且根据经济条件、文化基础、学生年龄、农事季节等具体情况,除了办好全日制学校,还千方百计采取了多种办学形式。

对早出晚归、流动性较大的渔民子女,除了办好夜校班,还根据有些渔民子女年龄大,过去没有上过学的特点,开设了速成班,用较短的时间,读完普及八年的课程;对有些经常外出搞运输,当天不能回来的渔民子女,发给“流动读书卡”,船停靠在那里,学生就可到

附近公社或大队的学校读书。这样，渔民和船民的子女，多年来要求读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队还办有夜初中班，让那些读过几年书，现已参加生产劳动的人继续学习。

对那些家务重的贫下中农子女，可以读半日制，允许迟到早退，也可以晚上补学，也可以带弟妹上学。对那些家长常年卧病或者本人瘫痪在床的残疾儿童，则采取包教包学的形式，由大队教师轮流送教上门。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公社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符合贫下中农的实际需要，有利于生产，能够加快和巩固农村的普及教育。

## 要引导自学，不要“满堂灌”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学，靠自己学。”“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我们只有坚决地这样去做，才能使學生真正牢固地掌握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有些同志却对自学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认为：“多教多得，少教少得，不教不得，强调自学还行？”因此，教学过程中，仍然出现了“满堂灌”的现象。

“多教”是不是就能“多得”？不见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学校里，教学从来就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围着转”，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教”的内容确实很“多”，学生只能整天忙于记笔记，背讲义，至于这些内容那是主要的，那是次要的，这样讲对不对，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处，如何用，全然没有时间考虑。这样“多教”，学生不仅不能“多得”，而且简直很难有所“得”，甚至有变成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的危险性。我校历史系有些教师在工农兵学生刚进校时，就曾采取过多上课、多辅导的办法，结果呢？学生囫圇吞枣，消化不了，在实际斗争中不会运用。就拿对“让步政策”来说吧，学生明知不对，却苦于不会分析批判，讲不清错在哪里。还有少数学生由于缺乏批判、分析的能力，对教师讲课内容全盘接受，竟把旧史书中某些错误的观点，也当成正确的东西来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说明，旧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废止不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学生学习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始终是认识的主体，教师、书本都只是学习的条件，是外因。要使学生学得好，必须依靠他们的内因起作用。如果学生自己不思考、分析，教师讲得再多也是无用。我们提倡讲课要“少而精”，自

的就是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自己研究问题。比如,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哲学系一年级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编写了《〈孟子〉批注》。在编写过程中,教师只作必要的辅导,主要靠学生自己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己查阅第一手资料,自己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结果,学生普遍反映收获较大。这也说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经过自己头脑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才能真正掌握所学习的知识。

衡量一个学生知识的多和少,不能光看他对本知识了解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必须看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的是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和独立地处理问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这种能力光靠教师抱着扶着是培养不出来的。提倡和鼓励学生自学,改变过去那种脱离实际、死背书本的学习方法,使学生的学习同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就可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学校里就养成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到了社会上,就能更好地经受三大革命运动的考验和锻炼。不然的话,学生总是在教师的束缚下学习,对书本上的条条他可以装一肚子,但是出了校门,仍然不懂得种田,不会做工,一碰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就分不清真假,辨不清是非。这样的人知识再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是不是以学生的自学为主,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而且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战士还是培养资产阶级“院士”的大问题。

要促进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敢想、敢说、敢闯的战斗风格,认真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和辩论,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有些同志总希望有安静的教学秩序,他们不懂得,开展集体讨论和个人钻研问题,这是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两个侧面。毛主席教导我们:“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通过讨论,各种不同的见解、观点,都反映到学生的头脑中,这就促使学生去思索,去分析,去找资料,通过思想上的矛盾运动,分清正确与错误。这样学得的知识,往往理解较深,也不容易忘记。当然,开展讨论,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热闹,而是要使学生通过讨论,真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对事物的认识。这就要求教师善于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研究教学中的中心内容,使讨论能够抓住重点,防止“开无轨电车”,同时,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善于综合和提高学生在研究和讨论中的各种好的见解,巩固和发展讨论的成果。教师也应当参加学生的讨论,不能认为自己一定比学生高明一等,端着架子放不下来。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今后改正就是了。只有师生共同讨论,官教兵,兵教官,才能使师生真正打成一片,做到教学相长。

要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根本的是走出课堂,坚持以社会为工厂,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去。“书上得来总觉浅”。学生在课堂里学习,总还是纸上谈兵。一走出课堂,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三大革命实践向教师和学生提出了大量的实际课题,而书本和讲义中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都要靠学生自己开动思想器官。这样一“逼”,学生的主动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哲学系有个小组在总结上海蔬菜供、产、销经验的时候,他们曾经简单地认为蔬菜供应的主要矛盾是“多”与“少”的矛盾,因此只要在多多少少上做好平

衡工作，矛盾就解决了。但贫下中农不同意这个看法，指出：“这是站在单纯买卖的角度看问题，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这一军将得好！它推动了教师和学生重新认真学习了《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他们经过讨论、分析，认识到蔬菜工作上的矛盾，实际上是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的具体反映，工农兵用毛主席哲学思想解决这个矛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广大革命师生走出校门，以社会为工厂，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为学员“自己研究问题”提供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对象，不仅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而且从现实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反对用教员的认识过程去代替学生的认识过程，但并不等于可以忽视教师的作用，更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我们主张讲得少而精，即不单数量要少，更重要的是内容要精。就是说，要言简意赅，抓住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富于启发性，善于以典型的事例来阐明一般的规律。为了帮助学生自学，还应当围绕某个中心内容介绍各种分歧意见，启发学生深入思考问题。所有这些，都不是过去那种随便念念几年以前的讲稿的讲课方法所能做到的。比如，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为我们搞好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战斗课题，这就需要教师围绕批林批孔的战斗任务，帮助学生提供资料线索，了解历史，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使学生更好地独立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就是对学生的课外阅读，也不应当看成份外的事情。学生读些什么课外书，怎样读，读书笔记怎么做，读了以后效果怎样，都是教员应当关心的问题。教师应当及时抓住阅读中的倾向，进行引导，帮助学生学会分析鉴别，那些是基本好的，那些是瑕瑜互见、需要加以区别的，那些是完全反动、必须批判的。去年，出版社重印了《红楼梦》等四部中国古典小说，在中文系，有的学生争相阅读，先睹为快。针对这种情况，教员把学生组成小组，在课余对这些小说进行评论。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学员用这些书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批判了反动的孔孟之道。这样，既提高了大家对剥削阶级文学遗产分析批判的能力，又使学生学到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提高了运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能力。因此，“课余”并不是“多余”，课外可以促进课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写作等活动的指导甚至比课内更重要。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我们应该努力把学生和教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好学生的自学，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一定要从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坚持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领域内的流毒，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夺取新的胜利。

##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

松江县天马公社商业站革命委员会

我们天马公社的商业工作，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貌有了显著变化。过去，商店集中在天马山脚下的小镇上，下伸店只有几个，农民要买点东西都要跑到镇上来。现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有了十八个下伸店，农民买生活用品，就不要再走出大队了。过去，百分之八十的商业职工蹲在小镇上，等客上门。现在，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在下伸店，留在站里的也把主要力量放在为农业生产服务上，有的还挑了“货郎担”，穿村走户送货上门。过去，下伸店只供应生活资料，现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有供应，还以卖带修，兼管收购。过去，商业职工不懂农业生产，顶多在太忙季节去参加几天农业劳动，现在，我们和社员群众一起种试验田，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推广先进单位的生产技术经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和贫下中农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

### “没有鸡哪里有蛋？”

一九七〇年以前，我们的禽蛋收购任务一直完不成。当时我们想，我们挨队挨户去收购，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收购任务完不成，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听了贫下中农的意见，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贫下中农批评我们的收购人员是“春天看不见，秋后一大片”。“生产不关心，收购瞎起劲”。有些贫下中农还责问我们，“小鸡不供应，大鸡哪里来？没有鸡哪里有蛋？”

“没有鸡哪里有蛋？”这句话说到我们商业工作的要害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教导，深入批判“坐镇办商”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认识到，生产和交换，生产是基础。交换离开了生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就是要做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促进派，积极地为发展农副业生产服务。而没有鸡也要有蛋，就是坐镇办商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反映，必须坚决克服。

思想端正了，立足点就转过来了。我们为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首先调整了商业网点，除了镇周围的三个大队之外，在其余十八个大队都设置了下伸店，同时，

把除了剧毒农药和部分大型农机配件以外的生产资料全部放到了下伸店供应。为了促进禽蛋生产的发展,我们分头下去,帮助生产队制订公养私养家禽的规划,把采购来的苗禽肩挑船载,挨队挨户送上门去。有些生产队怕鸡鸭啄食庄稼,每过芒种就禁养鸡鸭,我们就总结推广“粮食登场季节圈养,其余季节放养”的经验,使这些队饲养鸡鸭的积极性有了提高。此外,我们还在每年春秋,为鸡鸭打针,预防瘟疫。注意总结推广饲养鸡鸭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产蛋率。这样,家禽数量增加了,产的蛋多了,社员踊跃向国家交售禽蛋。一九七二年,全公社禽蛋收购量超过了历年最高水平。一九七三年,蛋品收购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现在我们下乡收购禽蛋,社员们高兴地说:“有鸡又有蛋,收购尽管来。”

### 从“银货两讫”到负责到底

肥料,是农作物的粮食。肥料供应工作的好坏,对农业增产关系极大。过去,我们认为,按期按量向生产队供应了化肥,还主动派人到市区运杂肥,而且数量不断增加,供应又比较及时,满以为工作已经做到家了。但是,许多社员却反映:“肥料不少,肥效不高,产量上去,成本增高。”这是怎么回事呢?下去一调查,发现分布在各生产队的二百八十只氨水小贮槽密封程度普遍不合要求,跑氨现象比较严重,氨水进槽,含氮量一般都从原来的十七八度下降为十三四度,有的只有十一二度。同时,施肥不当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例如,一吨酸性母液,原来可施二十亩稻田,有一个生产队却认为,“只有一分钱一斤的东西,哪有那么大的肥效”?他们把三吨酸性母液统统浇到十五亩早稻田上去,结果造成稻田倒伏。还有的队在中午阳光暴晒下浇氨水,造成肥料挥发。有的一面放水一面施肥,有的没有除草先施肥,结果不是肥料流失,就是肥料都被野草吸收去了。

我们有的同志原来认为,商业工作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再有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认识到从对工作要极端的负责任出发,只要农业生产还存在浪费,就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真正做好。同时,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如果各种商品肥料都贮存好,使用好,使肥效少走失百分之十,那就等于使全公社增加八百三十多吨化肥,可以节约农本十万多元。因此,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在柜台上“银货两讫”,而是要在商品出门以后,关心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做到负责到底,当好农业生产的促进派。认识提高以后,大家就在化肥运输、发货、装卸、贮存等环节采取措施,防止跑氨。我们把水泥船装氨水的水泥盖换上软木盖,还用废机油和黄泥密封。对生产队的氨水小贮槽,逐只进行了检修。过去,化肥碎包也出门,现在坚持破包不进仓,碎包不出门,有小洞就补,有大洞就换。生产资料组的同志还同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一起种试验田一百三十多亩,帮助生产队总结施好化肥的先进方法。

### 送上门的生意该怎么做

一九七二年夏天,棉田发现虫害。当时,红忠六队的六只喷雾器坏了,到下伸店要买

新的。有一个营业员就到仓库去提货。但是，另一个营业员认为应该先去看看情况再说。他到了生产队，看到喷雾器有的筒身锈坏，有的皮管破了，都是可以修好的。就把这些喷雾器带到店里，修好后又送去了。这样，一笔送上门的生意，却做成了修旧利废的服务工作。通过这件事，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我们都要努力去做，这正是社会主义农村商业的本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现在全公社十八个下伸店都办起了十多种修配业务。一九七二年，为各生产队修理电器设备、农机配件、五金工具、农用薄膜及生活用具达二千多件。去年，又进一步举办了旧货买卖和以卖带租的业务。

我们在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做有心人，商业支农工作是做不完的，天地是很广阔的。去年“三夏”大忙季节，全公社一百七十多台手扶拖拉机有三十三台的缸体坏了。为什么一下子损坏那么多？我们下去一了解，发现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熟练，发生了故障不能立即排除。这使我们想到，如果能把这些拖拉机手的技术水平提高一步，减少农机损坏率，不是既可以使农机更好地发挥作用，又可以使生产队节省农业开支、降低农本吗？当时，公社还没有专门培训拖拉机手的机构，我们该不该管呢？既然社会主义农村商业要当好农业生产的促进派，我们就有帮助生产队拖拉机手提高技术水平的责任。于是，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我们请上海工农动力机械厂的工人老师傅，帮助培训生产队的拖拉机手，提高拖拉机手的操作技术水平。去年两个农忙季节，全公社只损坏四只缸体。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机械使用效率，减轻了物资供应的压力，还降低了农业成本。

### 做促进生产的“样样管”

商业职工不仅要有促进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要有为生产服务的本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参加生产实践，学一点农副业生产技术。

我们这个公社，过去没有种蔬菜的经验，后来集镇工商业发展了，蔬菜供应不上，每天要到上海县去运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公社内自己种菜。问题是我们商业部门要不要管。有的同志说，“商业管种亩，真的变成‘样样管’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对发展生产有利的事就要去管，“样样管”是我们商业职工的本份。于是，负责蔬菜供应的职工就组织集镇附近的生产队干部、社员到上海县学习种菜技术，发展蔬菜生产。过去，这里的韭菜又细又老，产量很低。现在，学习了先进种植经验，这里的韭菜长得又粗又嫩，产量也提高了。发展蔬菜生产还要解决留种育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细品种，每季都要买秧苗来种，很不方便。我们为了做到种子自给，又和社员一起外出取经，一起试验。秧苗的问题一解决，蔬菜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加，就基本上满足了城镇居民的吃菜需要。

再拿中草药的收购来说，光靠等货上门就不行。有些中草药的货源数量少，花工大，采集比较困难。例如，蛤酥要从癞蛤蟆身上一点一滴地刮浆，平均一百二十只癞蛤蟆才能刮到一两。糯稻根要从田里一棵棵挖出来，剪下根须，洗净晒干。怎样才能聚沙成塔，完成收购任务呢？医药门市部的同志亲自实践，摸索出一套剥制方法和专用工具来，然后

到茶馆宣传示范,到学校上课,发动社员和红小兵捉癞蛤蟆,挖糯稻根。依靠群众大干的结果,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每年采集的糯稻根达二三百担,癞酥近二十斤。同时,下俸店职工普遍学习了识别中草药和采集技术,有的还上天马山采制中草药标本几百种,帮助大队培训采集人员。这几年每年收购的中草药达一千多担,使生产队每年增加收入二万多元,生产队的合作医疗事业也得到了有力支持。

## 收购工作也要促进农副业生产

在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工作中,通过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农村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职责。过去,社员向收购站交售棉花、生猪、草包等农副产品,我们有些检验员在分等论价的时候,往往都是由他们自己一人说了算,甚至明明自己说错了,也不肯改正。社员因此很有意见,说他们是“铁口”。现在,为农副业生产服务的方向端正了,这种情况也就起了变化。

农副产品一般都是凭肉眼测定,检验结论很难完全正确。有一次,永忠四队交售两批棉花,第一批检验为三级,第二批检验为四级。社员问,为什么同样的棉花会有两个等级?检验员重新检验,发现第二批检验果然有偏差,就立即纠正过来。以后,我们改进了检验办法,每次收购棉花,确定等级后都留下棉样,定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公社干部和棉花检验员三结合进行复验,发现定级偏低、少给生产队价款的,就坚决补给。收购生猪,凡是社员交售的生猪,如果双方在确定等级时意见不一致,就在当地屠宰,按屠宰后的实际情况确定等级。生产队交售生猪,检验后一一做上记号,屠宰后发现哪头猪定级偏低了,再进行补算。有时,检验员还帮助生产队做好分级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就兼顾到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当然,在农村还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情况下,也有极少数人在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时,想以次充好,提高收购等级和价格。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坚持革命原则,正面指出,进行批评教育。

要真正做好收购工作,必须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工作。草织品是我们地区的传统副业产品,也是我们每年收购数量较多的农副业产品。但是,过去我们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看到供不应求时就拼命收购,越多越好,出现积压现象,就拼命压价,甚至拒绝收购,结果破坏了草织品的正常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收购政策,加强对草织品生产的计划领导,帮助有条件的队办草织品厂。有些生产队草源不足,我们就从草源多的队进行调剂。还积极推广省柴灶,从烧柴中节省出大量稻草来。东方红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以前因为草源少,不织草包,自从普遍改了省柴灶,稻草有了积余,去年开始也搞草织品生产。去冬今春,全公社草包收购量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近三倍。

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坚决地立足生产,面向生产,我们商业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更多的工作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努力去做。



# 漫话大饼炉子

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革命委员会

很久以来,做大饼总是那个样子,烘大饼的炉子也总是那个样子。去年春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大饼炉革新了,在短短一年中创造出了“单翻式”、“双翻式”、“滚筒式”、“蝴蝶式”、“风车式”等许多有特点的新式烘焙炉子,新创造层出不穷,犹如百花齐放,竞相争艳,迎来了全市整个饮食行业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春天。

大饼炉子的革新,看起来固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小中也可以见大,在大饼炉子的革新过程中同样有一个怎样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

旧式炉子生产的大饼,“底青、面黄,香松脆”,劳动人民都喜欢吃。早晨上班,一副大饼、油条,既方便,又经济实惠。可是,制作这种大饼的方法,实在落后。做大饼的师傅,一年到头,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炎夏酷暑,都得露着胳膊把一只只大饼送进炉膛,再一只只把它钳出来。送进去,要弯腰看炉膛,拿出来,又得弯着身子。在我们行业有句顺口溜:“一只大饼两鞠躬,手臂烫痛脸熏红。”你看,这种操作方法有多么落后!做大饼的师傅为了烘饼,冬天不好穿棉衣,夏天胳膊常烫伤,迫切希望改革炉子。可是以前干这一行的,一家一户,一只炉子,一块作板,一根面杖,小本经营,哪里谈得上什么闹革新呢?根据我国古书《齐民要术》的记载,一千四百多年前就是这样地烤饼的,历史可说是很悠久的了。一千多年来,炉子的式样也有些变化,但基本的操作方法总是那个样子。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总是要变的,要前进的。大饼炉子也不例外。一九五八年,饮食业合作化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消费者要求饮食服务提高服务质量。饮食服务业的职工也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以便多快好省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饼炉子的第一次革新。这次革新尽管没有成功,可是冲击了那种“老规矩动不得”的保守思想。我们今天这一次的革新,实际上就是飞跃进时那一次的继续和发展。

去年春天,第一只革新的大饼炉子出现了。从此,烘大饼不需要再用手直接从炉膛里进出,只要把大饼贴在一块铁板上,上下翻动,熟了以后铲下来就可以了。大家高兴地把

它叫做“翻板式”炉子，很快就在全区推广开来了。

革新和守旧是相对立而存在着的。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新炉子一出世，遇到旧习惯、旧思想的阻力实在不小。对许多同志来说，老式炉子已经使用惯了，新炉子要有新的操作方法，一时反而感到不习惯。还有，当新式炉子刚开始推广时，做出来的大饼，质量不够稳定，有时一炉大饼烘出来，有的火功没到，有的却烤焦了，还有的半焦半黄，吃起来不是那么爽口，顾客们很有意见。有个地方，一条马路两个大饼摊，一个用旧式炉子，一个用革新炉子。好多顾客纷纷跑到旧式炉子上去买。这一来，在我们职工内部更加引起了议论纷纷，有的人就提出干脆走回头路算了。

究竟要不要把革新坚持下去呢？这也是一场斗争。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总有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大饼炉子在一九五八年革新没有闹成功，固然有技术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原因。要是革新过程中遇到一点问题就回头，恢复老样子，那革新就永远不可能会有成功。

坚持前进就是胜利。我们饮食业职工对比了新旧炉子的不同特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老式炉子的火堆是圆的，成宝塔形，火焰向上，火力容易均匀，而新式翻板炉子是长方形，火力比较散，不易均匀，因此烘出来的大饼就容易有焦有生。此外，翻板炉烘大饼是正面烤火，熟得快，水分来不及蒸发，大饼内水份过多，因此就不够“香、松、脆”。原因找到以后，我们就从操作上加以改进，尽量使火力均匀，平时勤翻板，减少正面烤火时间，使大饼内的水份能够得到及时蒸发，有的还进一步改进了炉子的结构和炉板的材料。这样一来，做出来的大饼质量就显著提高了。

去年，我们区公司开过一次现场会。在屋子的里间用老式炉子和新式炉子分别烘大饼，然后送到外间，给参加会议的同志鉴别。这次会上，有许多是有一二十年经验的老师傅，但当一炉的大饼端出来时，就连他们也分辨不出究竟是用新式炉子还是用老式炉子烘的。成都北路一家大饼店的老师傅说得好：“只要思想放在炉子上，做出来的大饼就好，如果马马虎虎，即使在老式炉子上也会做出质量差的大饼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革新和守旧的斗争也是这样。正如我们职工同志所说的，“如果认为大饼炉子的革新已经差不多了，那么，今天的革新派就会成为明天的保守派。”我们广大职工，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总结经验，继续改革大饼炉子，一定要把它改得好上加好。



◆  
一 九 七 四 年

◆  
第 六 期

◆  
总 第 十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192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